

賊諜四出廣招徠： 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 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

盧正恆**

摘要

藉由滿、漢文史料，本文一方面探索明清鼎革之際，鄭氏所建立的諜報網如何運作；另一方面則瞭解清帝國如何透過該諜報網絡、降將認識「征服前」的福建沿海海島和域外臺灣的地理知識。根據本文，鄭氏諜報網不僅有著詳盡的分工、從事精密的敵後工作、更遍及各省，提供東南海疆邊陲鄭氏決定戰略的資訊。與此同時，大清帝國也反向利用鄭氏諜報人員的供詞、主動派出間諜、蒐羅鄭氏降將的資訊，在征服臺灣前接收關於東南沿海海島的認識。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滿、漢文版本《臺灣略圖》，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作為降將規劃的軍事作戰計畫，另一方面也成為帝國理解臺灣的呈現。這樣理解知識的過程，不僅一方面體現了身為近現代普世帝國的特質，同時也展現了征服過程中帝國與邊區的其中一種互動。因此，瞭解鄭氏諜報網絡和清帝國探知沿海情報，本文希冀能將清、鄭對峙放在近年受到帝國史影響下的清史、臺灣史脈絡下，藉以討論抵抗的邊區如何探知帝國，以及帝國如何認識未征服的邊區。

關鍵詞：帝國史、鄭氏家族、大清帝國、明清鼎革、間諜、《臺灣略圖》

* 本文曾以〈不可能的任務：鄭氏家族諜報網與清帝國〉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海洋史研究舉辦之「2018 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海洋亞洲的中心與邊緣：帝國、港市、離島』」，會中蒙評論人鄭永常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會議結束後也收到許多評論，也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之相關意見和精闢見解。標題結合自兩段文句，首先是《龍川縣志》中談到鄭經在三藩之亂時，派出許多間諜進行活動，清方稱之為「賊諜四出」；接著是《福州府志》在談到明末清初福建總督李率泰時，提到他面對鄭氏「專督福建，造戰艦，備糗糧，布間諜，廣招徠。于時鄭鳴駿、鄭纘緒、黃廷、周全斌、陳輝等各率眾來降。」參見書圖修、楊廷釗纂，《龍川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 9，頁 25；徐景熹修、魯曾煜纂，《福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46，頁 57。

** 埃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來稿日期：2019 年 1 月 4 日；通過刊登：2019 年 4 月 18 日。

- 一、前言
 - 二、文獻回顧
 - 三、鄭氏諜報網絡的運作
 - 四、大清帝國的海島地理認識與《臺灣略圖》
 - 五、結論
-

一、前言

去冬具疏展限，請以今年三、四月輕北風進兵。蓋為鄭逆奸細頗多，使賊知我舟師必用北風而進，然而出其不意而收之。臣在在密用間諜，亂其黨羽，自相猜忌。自去年逆艘糾集澎湖，欲抗我師，據險以逸待勞。設我舟師到彼，必由過澎湖西嶼頭，然後轉帆向東北而進。¹

這段文字是康熙 21 年（1682）3 月 1 日，施琅密奏要求「專征」鄭氏。密奏最後特別提到「臣當會商將軍〔按：寧海將軍喇哈達〕合詞具題，而將軍海務情形非所諳曉，又恐奸細窺探洩漏，是以自將戰略、師期密疏上聞，仰聽睿鑒」。從這段描述中可以得知三件事情。其一，鄭氏奸細頗多，能夠探知各種戰略情報，根據施琅的說法，倘若這份奏摺不是以密奏形式上呈，鄭氏的間諜們也很可能獲取此消息。其二，施琅本身也擁有間諜，並希望透過反間計來擾亂鄭氏的諜報網絡。最後，施琅此時已擁有了進攻澎湖的路線規劃，並對航線和地理位置已有所掌握。這段文字體現本文的三個主旨：鄭氏諜報網絡、清帝國反向探知鄭氏情報、水師將領的進軍計畫與該計畫轉變成帝國普世性的體現。

¹ 施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13 種，1958；1685 年原刊），卷上，頁 10。

自鄭芝龍到鄭克塽的鄭氏四代，以中國東南沿海島嶼作為貿易和軍事基地與清帝國抗衡長達 40 年，位處如此邊陲的勢力該如何在沒有現代通訊設備的狀況下，探知對方的軍事情報？又，帝國中樞該如何打探此邊區的諜報和知識，用以制定決策？欲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討論清、鄭對峙期間，鄭氏如何透過充滿軍事性質的間諜打探彼此消息，清帝國又如何透過間諜和曾經「我在那兒（being there）」的「親歷者」們，在康熙 21 年征服臺灣前，認識東南地區沿海島嶼和域外之島臺灣。

在過去，清、鄭對峙的歷史似乎常被視作中國王朝更迭、中國民族國家形塑過程的一部分。但近二十年來清史受到帝國史（imperial history）及相關研究取向的影響，例如何羅娜（Laura Hostetler）透過探討大清對於中國西南地區族群的民族誌（ethnography）、地圖學（cartography）編修，佐證大清作為近現代時期（early modern period）的「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一分子；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則聚焦清代官員、文人在臺灣的文學創作、圖像編繪，都展現了清帝國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² 因此，在帝國史的架構下，清、鄭對峙的過程也許值得被重新思考，那鄭氏也許更適合被當作抵抗「帝國擴張」的邊區勢力。

過往歷史研究中，甚少有近現代時期帝國和邊區互動能有如清、鄭對峙般有如此豐富又生動的史料，或許能作為所謂「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討論之一。³ 過往學界大多集中在帝國以強凌弱、如何征服和瞭解邊區；但對於帝國拓張過程中，邊區抵抗勢力如何探知帝國卻所知甚少。透過此研究架構，不僅僅能補足近年來受到帝國史影響的清史的學術缺憾；也同時能提供帝國史研究中，近現代時期邊區對帝國探知情報的豐富面向。再者，雖然對於「征服西南地區或臺灣後」的清帝國如何認識該地區已經有不少研究，但清帝國「征服臺灣前」，又是如何瞭解海島（如金門等）和更遙遠的域外臺灣仍有商榷的空間。

²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³ 「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由歐陽泰（Tonio Andrade）所提出，希望能從小人物間的互動和交流，從微觀來觀察更大的歷史架構。參見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Honolulu, HI) 21: 4 (Dec. 2010), pp. 573-591.

受惠於過去十餘年來，許多滿、漢文檔案的開放，諸如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內閣大庫檔案》中未出版的滿、漢文檔案可供查閱；2004年出版的《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共有3冊關於鄭氏滿文史料的漢文翻譯。此外，《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中收錄了上述部分滿文檔案的原件，足可提供筆者再次確認原文。本文因此試圖使用這些雖然零星但資訊豐富的檔案，一方面探究鄭氏諜報網絡的建立、運作、影響。另一方面，大清帝國在本身的官員、文人提供的殖民主義文學之前，如何利用同樣的諜報網絡認識海島和臺灣。藉由本文的分析，希望不僅僅能深入瞭解鄭氏的運作，更希冀能認識清帝國的性質。

二、文獻回顧

學界關於鄭氏的研究涵蓋廣泛的各種課題，但此重要的研究焦點，在近年來似乎有停滯的現象。一方面由於史料的數量、開放、運用等，都陷入某種程度的侷限；另一方面也因為學術觀點和議題限制了研究的可能性。有鑑於此，本文希冀利用滿文、漢文史料，透過帝國史的觀點，藉由軍事間諜和降將提供消息為例，來觀察清、鄭對峙期間的消息傳遞，以及邊區抵抗勢力與帝國擴張之間的關係。

帝國史的研究，經過二十年來不斷推陳出新，仍是相當重要的觀點。⁴ 一方面藉由跨疆域、文化與政治邊區，取代傳統國別史、民族史架構；另一方面，也透過比較近現代時期非歐洲帝國間的互動，認識帝國間的異同。同時，聚焦於文化、性別、族群的取徑也逐漸取代過往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等議題，是最近幾年帝國史研究的另一個發展方向。⁵ 西方的清史研究，也在此觀點影響下，產生不少成果。何羅娜和鄧津華的研究受此概念影響，將大清帝國對於其邊區的認識放在帝國史的脈絡下進行。何羅娜藉由「普世帝國」的概念，探究清帝國征服中國

⁴ 關於帝國史的研究趨勢，可參見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Washington) 117: 3 (June 2012), pp. 772-793.

⁵ Michael David-Fox, Peter Holquist, and Alexander M. Martin, "The Imperial Tur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 7: 4 (Fall 2006), p. 705; Peter C. Perdue,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 of Asia: Its Promises, Perils, and Prospects," *Thesis Eleven* (Clayton) 139: 1 (Apr. 2017), pp. 129-144.

西南地區後，帝國如何利用地圖編輯和民族誌編繪，認識邊疆、區分異己。⁶ 當西方學界文化史研究抵達了巔峰，加上帝國史影響下的清史研究，鄧津華運用「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理論，發展所謂的「想像地理」論述，分析清帝國征服臺灣後，旅遊人士、文人、官員對於這個新納入版圖的域外島嶼的地理想像認識。⁷

除了西方學界，探討清帝國對於被征服地區的認識，在中文學界同樣是相當熱門的議題，尤其以晚期中華帝國時代對臺灣的認識最受關注。1993年，莊雅仲探討《裨海紀遊》，將此書視為繼陳第《東番記》後，第一本中國對臺灣的認識，從神話色彩轉變為真實描述的里程碑。雖然該文重點在探究郁永河旅遊臺灣時心境的改變，並探究從他眼中看到的異己和文化巡旅，但文中也涉及清代以前，臺灣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個虛幻、神話的場域。⁸ 莊勝全對於清帝國理解臺灣有非常精細的分析。首先，對於康熙朝時，施琅、郁永河、黃叔瓚、藍鼎元等四位「我在那兒」的親歷者，講述清代官員對於臺灣印象的改變，從清領前神鬼怪誕的地點、鄭氏統治的罪惡淵藪，到最後由清領時代統治者不斷對這座島嶼進行文化再現，同時展現帝國對臺灣印象的縮影。⁹ 相較於莊雅仲、鄧津華、莊勝全聚焦於清帝國對臺灣的認識，2007年周婉窈討論明代漢人對臺灣這座鄰近卻又陌生島嶼的認識。該文主要聚焦於地理名詞的分析和作為航行標的的討論，討論明代「臺灣」被當成一系列的「點」，而非一座島嶼；之後又被海盜作為巢穴，最後成為東南海防的最前線，並在荷蘭殖民後才成為南北一氣相連的島嶼，也被納入複雜的歷史進程中。¹⁰ 2011年，黃美玲以陳夢林和藍鼎元二位親身抵達臺灣的文人所留下關於風景和山水的作品為例，分析二人在不同目的下，作為康熙末期文人透過文學描繪臺灣景致的代表，藉此體現人文風情和自然地理。¹¹ 2013年，在

⁶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⁷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⁸ 莊雅仲，〈裨海紀遊：徘徊於異己與自我之間〉，《新史學》（臺北）4: 3（1993年9月），頁59-79。

⁹ 莊勝全，〈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歷者的觀察為例〉，《臺灣風物》（臺北）56: 3（2006年9月），頁27-59。

¹⁰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0（2007年12月），頁93-148。

¹¹ 黃美玲，〈清初臺灣單篇山水遊記之探討：以陳夢林、藍鼎元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臺北）42: 1（2011年5月），頁25-47。

康熙朝研究的基礎上，莊勝全透過文化史的脈絡和視野，仔細梳理清帝國官員在不同時期對於臺灣的認識。¹² 綜上所述，透過「旅人」或「遊記」為引，無論是史學或文學，討論中國或漢人對臺灣的理解是相當熱門的議題。

莊雅仲和莊勝全等前輩學者對於清帝國在清、鄭對峙期間，除了將臺灣視為罪惡淵藪和怪誕神異地區外，似乎沒有太多的討論。主要原因在於上述對於「臺灣認識」的討論，都建構在同一個背景下：即是清帝國已征服臺灣，並且能夠有「我在那兒」的親歷者提供訊息。然而，清帝國征服臺灣前，難道沒有親歷者能提供訊息給清帝國嗎？清、鄭對峙時，清帝國對臺灣的認識、大清和鄭氏之間的互動，無法被放在文人或官員直接往來的架構下。當時清帝國和鄭氏的往來和消息傳遞，唯一管道似乎是帶有濃厚軍事性質的間諜人員。關於間諜的研究，過往大部分的討論都是集中在現代時期，這些研究絕大部分都聚焦在其軍事性質和組織活動等，包括大英帝國對清帝國和亞洲的軍事間諜探索行為，或者隨著貿易因應而生的「港際情報體制」。¹³ 又或者討論日本帝國在甲午戰爭前後，首次有規模性地建構從事調查行為的間諜機構，培植相關人才；¹⁴ 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於中國的情報機關之活動和戰略意義。¹⁵ 雖然有不少關於明清時期東亞地區諸國間傳遞消息的研究成果，以間諜作為主題獲得較多關注的是壬辰戰爭時期，日本、朝鮮、大明彼此的俘虜、投降人員不少同時身兼間諜身分，三國各取所需從被俘擄者處獲取軍事情報。¹⁶ 縱然如此，間諜作為特別又充滿故事性的歷史角色，卻從未被放在關於鄭氏的討論中。

鄭氏是海洋史、中國史、中西交流史等多種領域的熱門議題。¹⁷ 過往，學術

¹² 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

¹³ 例如 Richard J. Aldrich, "Britain'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London) 32: 1 (Feb. 1998), pp. 179-217; 朱瑪瓏，〈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臺北）32: 2（2014年6月），頁49-82。

¹⁴ 例如黃福慶，〈甲午戰前日本在華的諜報機構：論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1984年6月），頁305-331。

¹⁵ 陳榭，〈德國在華軍事情報機關（1941-1945）〉，《臺大歷史學報》44（2009年12月），頁153-194。

¹⁶ 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朝、明三國軍中之疫疾、情蒐與通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47（2017年5月），頁117-157。

¹⁷ 近年來關於鄭氏的研究仍有幾本相當重要的著作，例如鄭維中在2013年的著作、杭行（Xing Hang）在2015年發表的作品外，相關研究近年來相對過去而言，數量上已有顯著減少。參見 Weichung Che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

界對清、鄭雙方通信往來，已經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張莛在探析鄭成功的「五商」組織時，就曾提及該組織的附帶功能之一即是收集軍事情報。¹⁸ 陳在正關於鄭芝龍在清、鄭談判過程中，不僅主動向清廷獻策，更派出信使主導和試圖操作整個談判的運行，文中批判鄭芝龍的政治氣節，認為他最終被囚禁斬殺與黨爭無關，單純是因為已無利用價值。¹⁹ 吳正龍雖然沒有提及任何諜報人員，文中所涉及的信使、使者是幫助清、鄭談和的重要中間人，文中並未討論他們同時也是間諜網絡的一份子。²⁰ 綜之，除了張莛曾略有提及外，對於鄭氏間諜研究和清鄭對峙期間，雙方互動的理解仍舊相當有限。

換言之，對於「清帝國對邊區認識」或「清帝國對臺灣認識」此二議題，從前大多集中探討帝國如何認識「征服後」的邊區。莊勝全、何羅娜、鄧津華等的研究無疑地開展了清帝國征服某地區後對該地區的殖民認識。然而，學術研究上仍較缺少「征服前」，帝國如何在沒有官員、文人親身接觸的狀況下認識邊區，尤其是那些從未涉足過的邊區。清、鄭對峙時期，雙方的往來無法透過正常管道的文人旅遊文學、官員調查等方式，僅能透過間諜和降將的消息傳遞，如何透過間諜和降將的觀點和角度，一方面理解邊區的鄭氏勢力如何調查清帝國，另一方面也瞭解清帝國如何認識征服前的臺灣和沿海海島。

在此過程中，本文標題所稱的《臺灣略圖》是清初，大清從降將處獲取較為陌生的臺灣島的情報和征服軍事規畫圖。這份地圖曾被以《臺灣軍備圖》或《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稱呼，是現存年代較早的清代臺灣全島圖。2006年鄭喜夫考證此圖之由來，認為該圖是「明鄭時代僅存之唯一地圖」，並主張該圖正是康熙4年（1665）鄭氏都督朱瑛於浙江降清時所獻，而非「清方密探所繪」。²¹ 此圖較為特別之處是有滿文黏貼標籤的版本。林士鉉對此圖有較為全面的研究，不僅仔細分析該圖漢文描述，同時運用清代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圖相互比較，最重要的是探究滿文版本的地圖，認為滿文版本不僅提供軍情給滿洲統治者參考，更可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¹⁸ 張莛，〈鄭成功的五商〉，《臺灣文獻》（臺中）36: 2（1985年6月），頁15-34。

¹⁹ 陳在正，〈鄭芝龍在清鄭和談中所扮演的角色〉，《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1988: 3，頁117-124。〔按：中國大陸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²⁰ 吳正龍，〈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²¹ 鄭喜夫，〈〈永曆18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臺北文獻（直字）》（臺北）155（2006年3月），頁27-43。

以補充漢文的意思。並且同意鄭喜夫所言，即該圖反映永曆 18 年（1664）7 月間的情勢。透過分析滿文檔案後，林士鉉認為該圖應是康熙 4 年 9 月朱瑛來降後，浙江總督趙廷臣奏摺中提到的繪圖。林士鉉之文章無疑構築更詳細的論證，不僅比較該圖與其他地圖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提供滿文部分的釋疑，並且透過一手文獻論證該圖形成的原因與降將有關，提供這份地圖極為重要的學術分析。²² 本文同意朱瑛等人曾在清政府指示下，繪製一幅地圖上繳御覽；然而根據《臺灣略圖》中的資訊以及大清水師將領之後的軍事行動，此圖的繪製者或主導者更可能是曾在鄭氏中位高權重、且曾身在臺灣的周全斌所規劃的軍事進軍路線圖及提供的訊息。更重要的是，當漢文的軍事規畫圖被貼上滿文翻譯標籤後，此地圖的意義已經遠大於軍事地圖和情資，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清帝國的「普世帝國」性質。

從前鄭氏間諜無法被仔細探究的主因在於資料的缺乏。有賴於近年來許多滿文、漢文檔案的公布與開放，本文因此能夠以充滿故事性的鄭氏間諜作為主題，討論清、鄭對峙期間兩個方向的情報探查。首先，本文以鄭氏在中原本土（China proper）建立的諜報網為主軸，試圖將帝國和邊區互動放置於新發展的帝國史脈絡下，藉由邊區對帝國的諜報探知，修正過往以帝國為主、邊區為次的研究視角。接著，以清帝國為主軸，討論帝國如何透過審訊諜報人員和降將提供的訊息，認識尚未佔領的海島地區。本文希望能提供兩處貢獻：其一，探究鄭氏諜報網絡的運作以及相關影響；其二，來自內亞的大清帝國如何反向利用鄭氏諜報網絡、主動派出情報人員，及透過鄭氏降將三種方式，建構關於東南海島、域外臺灣的地理認識。

三、鄭氏諜報網絡的運作

鄭氏有無間諜網絡？答案是肯定的，已有諸多例子可供證明。例如鄭氏將領劉國軒，就被譽為：「又善用間諜敵人情形，纖悉必知，時謂之劉怪子」。²³ 同是鄭氏舊部的施琅也將間諜發揮的淋漓盡致，受康熙皇帝讚許：「爾能上度天時

²² 林士鉉，〈任教巨舶難輕犯 天險生成鹿耳門：院藏滿、漢文《臺灣略圖》簡介〉，《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49（2012年4月），頁40-48。

²³ 彭孫貽撰、李延罡補，《靖海志》（文叢第35種，1959），卷4，頁89。

下揆地勢，更行間諜收合人心。」²⁴ 學界雖然意識到「諜報網路」的存在，如張莢曾指出鄭成功的五商組織除了經商外，也包括收集情報。然而，對於諜報網絡的認識僅限於此，究竟此組織如何運作、細節如何，均仍屬未知。

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南下，過程中陸續擊敗軍閥、流寇和南明勢力。隔年（1645），唐王朱聿鍵在福建成立隆武朝廷，鄭芝龍兄弟成為其軍事上的支持者。然而，順治3年（1646）清軍南下時，鄭軍棄守邊關，隆武朝廷兵敗如山倒，不久後鄭芝龍降清。在這個降清的過程中，間諜同樣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角色。當時清廷內部除了南安人洪承疇外，泉州人黃熙胤也至關重要。黃熙胤曾派蘇忠貴繞過戰雲密布的南方，在順治3年3月面見並試圖拉攏勸降鄭芝龍。當時鄭芝龍在南方的影響力、軍力、經濟力是各方亟欲爭取的對象，曾與鄭氏在唐王朝廷共事的蘇觀生，此時也從廣東派人拉攏鄭芝龍。然而，已經得知清軍將在6月渡江進入福建的鄭芝龍，表示希望攻取廣東作為降清的大禮。²⁵ 最終降清的鄭芝龍，在征南大將軍博洛「引領」下，率部分家人與將領北上北京。到達北京後，鄭芝龍被編入正白旗，其餘部下則分別編入他旗。²⁶ 然而，鄭氏勢力在南方仍盤據各地，尤其東南地區海島幾乎全在掌握中。²⁷ 一如朝鮮的燕行使團也曾打聽到這樣的消息：「擁甲百萬，割據福建一半，欽戴永曆，不順清朝。」並表示清廷有計劃向朝鮮徵調舟師和火手萬人，用以南下福建抗衡當地的海賊，但被部分重臣反對。²⁸

抵達北京的鄭芝龍似乎不像過往所指稱地遭到軟禁而無所作為。相反地，他在北京各界仍保持相當的活力。在政界，鄭芝龍除了與滿、漢官員應酬往來外，也多

²⁴ 施琅，《靖海紀事》，卷下，頁77。

²⁵ 參見夏琳，《閩海紀要》（文叢第11種，1958），卷上，頁2；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第1冊，頁1。

²⁶ 雖然檔案均稱鄭芝龍被納入正黃旗，但是鄭芝龍曾自述，最初是被撥入正白旗。參見鐵保等纂修，《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36，頁2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丁編》（臺北：該所，1997），第1冊，頁88。此外，關於鄭家的旗籍歸屬與鄭克塽投降後被編入八旗的鄭氏家族成員在清代的活動，可參見盧正恒，〈旗與民：清代旗人鄭氏家族與泉州鄭氏宗族初探〉，《季風亞洲研究》（新竹）2（2016年4月），頁115-151。

²⁷ 此處所指的東南海島包括金門、廈門、銅山、南澳等，這時均由鄭氏舊部控制，控制南方海島的諸將即是所謂的「鄭部」。關於「鄭部」的討論可參見 Cheng-heng Lu,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Bandits: The Rise of Zheng Zhilong and His Organization, the Zheng Ministry (Zheng Bu, 鄭部),"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00-17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p. 132-155.

²⁸ 此時朝鮮使臣探聽到的消息是，鄭芝龍之子「鄭進功」，參見李滄，《燕途紀行·下》（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卷7，頁9-10。

次在順治皇帝身邊服侍並接受諮商，例如順治 11 年（1654）12 月，曾陪同順治皇帝前去南苑（即南海子）等處行宮休憩和商議。²⁹ 在商界，鄭芝龍雖無法從事過去的老本行海外貿易，但在大運河沿線擁有相當多的生意。³⁰ 此外，鄭芝龍在北京城與大運河終點的通州經營數間當舖，並交由專業人才管理。³¹ 這些當舖不僅提供鄭芝龍與家人在北京運作的經費，同時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功能，即是充作在南北往來傳遞消息間諜（鄭氏的間諜自稱為「經紀人」）的臨時住所和躲藏之處。³²

透過龐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鄭芝龍一方面為了在北京確實掌握政界動向，另一方面也向位於南方的鄭氏提供情報。值得一提，雖然此諜報網絡可能是分別隸屬不同鄭氏勢力（如鄭成功、鄭鴻逵、鄭芝龍之母等），整體而言鄭氏仍建構了一個分工嚴謹的組織。北京的網絡無疑由鄭芝龍主導，所有探知消息的諜報人員和行動除了鄭芝龍在北京的管家謝表、書辦尹大器、心腹任小八、宋崇德、徐成外，無人知悉整個網絡的運作。可惜，順治 13 年（1656）招撫鄭成功破局，鄭芝龍在北京不再炙手可熱，反而成了燙手山芋。因此，隔年（1657），與鄭芝龍有隙的尹大器，供出鄭芝龍諜報網絡全貌，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³³ 尹大器的舉發，讓清帝國得以一窺鄭氏諜報網絡的全豹（參見表一）。³⁴ 因此，鄭氏諜報網絡中的間諜雖然可能從屬於不同主人，卻仍有著完善的架構、分工明確，且能從帝國朝廷中樞攫取最直接且機密的情報。最重要的是，幾乎沒人知道彼此的身分。

這樣完善的情報網絡發揮了甚麼作用呢？順治 11 年 12 月，清廷決議任命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統帥南征福建的一切事宜。³⁵ 隔年，鄭成功派遣的邱尚、盧揚抵達北京，雖然鄭芝龍當時身在南苑、皇帝身旁，理論上邱、盧二人斷無可

²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102。

³⁰ 例如鄭芝龍派有貿易商田忠年在杭州經營，在蘇州、杭州等地也有相當多的放款，例如順治 11 年就曾派遣家人到這些地方收帳。參見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81、151-154。

³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280-284、392-402。

³²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312-314。

³³ 巴清監修，《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卷 40，頁 317-31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丁編》，第 3 冊，頁 255。根據記載，尹大器因為舉發而受封爵位：「尹大器舉首鄭芝龍在獄私與逆子鄭成功往來通信，密行事款，鞫勘俱實。應授拖沙喇哈番，得旨，尹大器著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參見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卷 4，頁 84。

³⁴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2 冊，頁 271-275。

³⁵ 巴清監修，《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卷 87，頁 687。

能進到宮中與鄭芝龍會面，但鄭芝龍仍透過不知名的方式傳遞關鍵消息給二人，要他們告知鄭成功：「大兵往福建去，快著報信去，差往福建去。」³⁶ 因此，當清廷招撫鄭成功失敗後，眾臣指稱鄭芝龍時常透露情報給鄭成功一事，並非空穴來風。據這則材料以及表一呈現，鄭芝龍確實主動打聽、並向南方傳遞有關清軍的軍事情報。

除了鄭芝龍主動派員傳遞消息外，位處海島的鄭氏諸勢力，也會遣間諜前往北京查探消息。除了前述由鄭成功派出的邱尚、盧揚外，鄭芝龍之母在順治 12-13 年（1655-1656）派出兩批人員北上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例。順治 13 年時，由於清廷招撫鄭成功的計畫幾近破局，鄭芝龍處境堪憂，因此他已被處死的謠言流竄。就連遙遠的臺灣也流傳著「國姓爺的父親、老官員一官已經在北京被韃靼人剝皮致死」的消息。³⁷ 試想北京、福建六千里之隔，甚難證實謠言的真偽，為了釐清消息的真偽，鄭芝龍之母因而二次派員打探。

首批人員是丘賢、黃傑、董登、門九四人，於順治 12 年 8 月從金門出發。雖然四人一齊出發，但有不同任務。其中丘賢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因為他不僅是鄭成功曾派往北京の間諜丘尚的親兄長，也曾在順治 6 年（1649）陪同泉州的「林鄉宦」（可能指林欲楫之子）與「洪經略」之子（可能是洪承疇之子，後在北京考中舉人的洪士銘）前去北京，換言之他已有來往北京、福建的經驗。四人打扮成賣煙的商人，透過黃傑的關係，從饒平總兵吳六奇麾下的材官葉春拿到印票，因此得以從金門經過饒平，接著朝山西平陽府前進。董登和門九另有不知名的任務，在平陽府安邑縣東閣莊時，與丘、黃分道揚鑣。順治 13 年 2 月 27 日，丘賢和黃傑二人，帶著銀 28 兩、煙 39 包抵達北京。到了北京後，丘賢住在舊識陳裁縫家中，但黃傑的住所何在，邱賢並不知道，二人平時則在海岱門（崇文門）碰面，交換情報。丘賢拿著煙，接連數日到福建人林平和倪七兒開設的煙鋪兜售，最終等到鄭世忠的家人王省前來煙鋪兜售書籍，引起林、倪二人的恥笑：「誰要你的書。」然而，林、倪不知道的是，兜售煙和販售圖書之間的關聯或許是不同

³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己編》（臺北：該所，1999），第 3 冊，頁 292-293。

³⁷ 《熱蘭遮城日誌》的譯者在註解時，特別指出鄭芝龍理應去世於 1661 年，因此認為此消息其實是錯誤的資訊。但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將此謠傳當作是流傳於福建一帶極為重要的消息，以至於連往來兩岸的商旅和荷蘭人都聞知此事。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4 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 73。

表一 鄭氏諜報網北京任務表

姓名	職位	任務
謝表	管家	負責彙整南方傳來的情報後，直接向鄭芝龍報告。同時安排奸細的住宿、躲藏，並且負責親自從當舖撥下盤纏和獎賞。
張宗	管門人	南方來的奸細到鄭芝龍大宅後，由他直接引見給謝表。
朱立奎	當舖管理	其當舖負責收到謝表通知，撥出盤纏和獎賞給奸細，每人約可得到 80 兩。但是並不知道為何撥出銀兩，以及收受銀兩者的身分。
錢忠宣	兵部辦事	負責將兵部內部的密本抄寫一份，再交給張元。
張元	傳遞消息	謝表的岳父，負責到兵部將錢忠宣抄寫的密本抄本拿出，並交給謝表。
高控	傳遞消息	從謝表處取得消息，轉傳遞給後來被嚴加看管的鄭芝龍。此外，負責將書信或消息轉交給林玉。
鄒泰	傳遞消息	從謝表處取得消息，轉傳遞給後來被嚴加看管的鄭芝龍。
葉四	探聽消息	鄭世恩家人，負責在北京地區打聽消息、情報。
林玉	往來南北	負責往來北京和福建海島，傳遞消息。
張施	傳遞消息	鄭芝豹家人，負責將鄭芝豹處獲得的書信轉交給高控，但並不知道書信內容。
朱鳳明	當舖成員	負責藏匿奸細在當舖內，但並不知道奸細的身分。
楊子藤	探聽消息	黃道周的子侄輩，一方面負責打探北京的消息，另一方面負責藏匿奸細於當舖中。
李道	探聽消息	五人為一組，負責以二萬七千兩銀子買賣木材為名義，打聽北京周圍地區的消息，並且回傳鄭成功處。
施欽	探聽消息	
馬良	探聽消息	
徐成	探聽消息	
李軫	探聽消息	
宋崇德	滿文翻譯	負責將翻譯的滿文檔案、機密直接回報給鄭芝龍。
李觀	當舖管理	負責撥給金錢並藏匿奸細，但並不知道這些人是奸細。
徐月	商店管理	負責提供接待和住宿
任小八	芝龍心腹	熟知諜報網內情
李關	藏匿奸細	負責藏匿海上來的奸細
蔣欽	藏匿奸細	鄭芝豹管家，海上來的奸細住在蔣家。

資料來源：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151-154、190-193、271-275、298-301。

屬的鄭氏間諜們共享的暗號，因為相同的手法也曾被發現於興化。順治 12 年正月，「旭遠」商號的所有者顏精官派僕人陳嘉謨，於正月 25 日從安平出發，27 日抵達興化，當時興化外有鄭成功部下陳六率領軍隊駐紮，陳嘉謨因此前往索取票引。陳嘉謨在此時被收買成為奸細，並奉命前往興化，與負責收集情報的鄭氏間諜李文炳（雖然後來獲悉其名，但陳嘉謨僅知道他叫「李相公」）接頭。這次案件中，有一涉入的間諜名喚林君政，因為生病而由他兄長林君俊代替取錢去福

州賣煙，當時收集情報的暗號即與「圖書」有關。除了圖書和煙的共通暗號外，丘、王二人間也有某種暗號得以確認雙方身分。雙方隨即到一旁暗巷交換情報，丘賢除了得知鄭芝龍仍活著，也知悉鄭芝龍等人的監禁已經略有寬鬆：「鄭芝龍等先是五條鐵鎖，如今只三條鐵鎖。」雖然丘賢最後被逮捕，但消息已由丘賢轉交給黃傑。因為丘賢的任務僅是打聽消息，黃傑則負責傳遞消息，因此丘賢並不曾被告知黃傑回去的路線和計畫。當丘賢被捕審訊時，他並不知曉黃傑的去處，讓清廷無法有目標地阻止和攔截此消息南返；黃傑最終在順治 13 年 2 月 30 日帶著「鄭芝龍不曾死」的口信及一封書信從山東經水路返回金門。³⁸

值得一提的是，鄭芝龍初到北京時，居住於齊化門小街（朝陽門小街）上，順治 10 年（1653）5 月時獲准到國子監對面空地上營建新宅。³⁹ 然而，除了黃傑、丘賢碰面的海岱門，順治 11 年 4 月抵達京城的前南明政權武毅伯、施琅叔父、鄭芝龍麾下大將施福，也曾造訪京城並在鄭芝龍左右活動服務，直到隔年 2 月才離開，被朝中重臣佟國器怒斥：「京城何地，詎容奸宄藏匿耶！」⁴⁰ 施福當時就居住在正陽門外徐月的店內。⁴¹ 換言之，鄭芝龍的部下或間諜均散布在京城四周，不會圍繞在他鄰近的區域，或許因而減少彼此互動和被捕獲的機會。

當鄭芝龍之母派出探查鄭芝龍消息的人員，她無法得知丘賢等人是否能成功，因此為了盡可能地分散風險，在丘賢等人從金門出發後的兩個月，鄭母再派袁彩雲前往北京，向之表示：「據京城來人說，你大老爺被囚禁，五老爺被捉拿。我不得實情，內心焦慮。你往京城探取實情，以寬我心。」袁彩雲之所以是合適的人選，原因有三。其一，袁彩雲自幼在鄭家服務，鄭芝龍、鄭芝龍五弟鄭芝豹都認識他，因此鄭母無須寫書信留下證據，僅以口頭告知任務，如此將能降低被捕獲後搜出書信的風險；其二，因為他的兩個兄弟都在江南巡撫中軍麾下服務，因此能從江南大路前往北京，路線將與走饒平的丘賢等人不同，或能分擔風險；

³⁸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己編》，第 3 冊，頁 231-234、292-293。實際上，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曾在順治 12 年得知鄭芝龍已經從監禁中釋放的消息，但根據丘賢的調查，應該不是被釋放，而是監禁漸鬆。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544-545。

³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丁編》，第 1 冊，頁 88。

⁴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151-154。

⁴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190-193。

其三，跟丘賢一樣，袁彩雲曾在順治4年、11年二次來回福建、北京，因此有往來南北、熟悉路途的經驗。順治12年11月1日，袁彩雲從金門動身前往江南地區，之後在時任江南巡撫中軍旗鼓的弟弟袁士元陪同下，拿著巡撫中軍快役的長兄袁昇給予的票文和文書，袁彩雲比丘賢等人早一個月於隔年1月3日抵達北京。然而，因為鄭芝龍已被嚴加看管，袁彩雲花了近十五日才見到鄭芝龍的當舖管理人陳柱，但卻只得到「老爺無書可捎，你想去即去。」根據鄭氏在北京的諜報分工，袁彩雲想必也見到管家謝表。諷刺地是，袁彩雲居然被謝表及陳柱出賣，交給巡查的章京管應祖。⁴² 姑且不論袁彩雲和丘賢是否是唯二被派往北京的探子，兩批打探消息者不僅經驗豐富、且曾來回福建、北京多次，人員更分走兩條不同路線，加上熟識清軍內部的人員得以索取票引。雖然丘賢、袁彩雲均被抓，但至少鄭芝龍未死的消息最後已由黃傑在2月30日從北京經由山東、走水路，約莫在二至三個月內傳到金門，讓鄭母獲知。⁴³

根據前述鄭芝龍在北京擁有的龐大複雜的諜報網絡，加上與位於福建的鄭氏諸勢力往來，可以知道鄭氏在帝國中樞的北京盤根錯節，甚至深入官僚體系內部。除此之外，在帝國中樞以外的地區，鄭氏的諜報網除了前述的山西外，也更深入湖廣、廣東等地區。例如順治15年（1658）2月，鄭成功派奚奇雄等九人扮成商人從汀州出發，沿途還曾以經商為名雇用挑夫做嚮導，在汀州府桂花園住六個月，又到江西許灣住五個月，又到樟樹鎮住三個月，在湖廣、江西交界的麻山

⁴²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1冊，頁280-28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丁編》，第2冊，頁145-146。

⁴³ 由於此時鄭鴻逵（鄭芝彪，鄭芝龍四弟）此時已肌肉萎縮，導致下半身行動不便，因此寄情於修園亭、種花木、吟曲、品笙等活動，並於順治14年3月16日去世。鄭芝龍未死的消息對於鄭鴻逵而言或許心靈上的安定作用遠大於其他作用。相反，雖然黃傑帶回來的消息應該匯報給鄭母跟鄭鴻逵，但這消息也許會被鄭成功知悉。此消息對鄭成功有何作用？這段期間，鄭氏方面曾發生幾件大事。首先，該年5月時，鄭成功以縱放施琅為由，斬殺蘇茂。此外，順治13年6月27日（閏五月六日），這時大概也是黃傑抵達福建回報消息的時間，鄭成功宣布大員和廈門之間的貿易禁令，理由是因為鄭氏商人在大員遭到刁難。然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猜不透為何會在這個時間點突然實施禁運政策。此禁令在實行一年後，隨即於隔年解除；同一時間，趁著荷蘭東印度公司派何斌前去鄭成功處時，鄭氏將領們要求何斌等人支付一筆從鄭芝龍投降之後就一直拖欠著高達十三萬兩的租金。參見邵廷采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南紀事》（文叢第96種，1961；1697-1698年原刊），卷12，頁158；劉獻廷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廣陽雜記選》（文叢第219種，1965），頁28；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文叢第133種，1962；1903年原刊），卷7，頁16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4冊：1655-1662》，頁96-98、186-192、210-212；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434-445。

住三個月，隔年（1659）9月到達湖南西山，之後又在順治18年（1661）3月前往容美土司田甘霖家中。順治17年（1660）7月，奚奇雄等人往在東祥寺時，12月有叫「潘太監」者來領奚奇雄去某地，但同行者並不知道他究竟去哪。清廷在審理此次間諜案時，相當費解為何如此多的間諜僅以商人身分作為掩護就能在境內、通過關隘待上數年，且深入土司地區，卻直到此時才被發現。⁴⁴

另外一個極為有趣的案例發生於順治17年元月。一名身著喇嘛服飾自稱是「外藩和尚」者，出現在廣州城靖南、平南王府外，手持一面金牌：「喇嘛周遊天下名山，著所經各省府州縣供給夫馬護送，不得有誤，所經關津，不得阻止，特賜此牌。夫役三十。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欽命頒賜。」喇嘛宣稱是大同府人，7歲被抓到小西天夾皮露部，奉諾諾王之命修身為僧。順治8年（1651）由順治皇帝派兵救出，三年後抵達京師，並住在內宮。順治14年（1657）11月11日奉順治皇帝之命，出京周遊名山，當時拿有御頒寶牌跟部文各1道。二王和巡撫對此陳述驚訝不已，卻又覺得漏洞百出，因此寫信詢問京城各部是否曾經發放過類似的金牌。然而，各部均否認曾經發出這樣的金牌，於是在順治17年5月將此這名喇嘛押解到京城。到了北京，喇嘛改口稱自己是在南苑睡覺時，被順治皇帝帶回，並堅稱金牌是皇帝所給而非各部。但是，喇嘛的新供詞很快就被戳破，因為他不僅不會念經，也不懂藏文、蒙文或其他文字，更在他的衣服內發現縫有「兩面龍案黃旗」。眼看謊言被戳破，喇嘛隨即供稱他叫杜良才，叔父是住在廣州和平街的投降總兵杜英浩，因為叔父跟鄭成功有勾結，派他去福建平潭交易後，為了打探消息才去王府拿路引。清廷雖無查到杜英浩此人，但卻查到廣東確實有一名投誠總兵杜永和住在廣州和平街。朝廷於是在康熙元年（1662）10月將杜永和逮捕到京城，經過交叉審訊發現杜良才對杜永和幾乎一無所知，且供詞矛盾漏洞百出。經過再次審訊，杜良才表示他真名侯觀郎，7歲在五臺山出家，10歲周遊天下，原先想去福州拜訪「唐王之子」，因為跟杜永和有仇才嫁禍給他。這段陳述也不是真的。經過長期的審訊，侯觀郎供出實情：他是延平府將樂縣人，鄭成功攻陷並屠殺土口村後將10歲的他留在身邊服侍，順治15年5月被派去廣東刺探軍情，金牌跟龍旗都是鄭成功所提供，被指示倘若被捕獲，要表示自己是喇嘛，

⁴⁴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2冊，頁311-318。

他假扮喇嘛的身分騙過廣州城內的人，租屋的山西會館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⁴⁵

侯觀郎的故事提供極為豐富的訊息。首先，鄭成功給予的金牌是要令其通行順暢，但龍旗的作用為何？是否藉以聯絡抗清勢力或是作為信號？此外，既然侯觀郎可以住在山西會館而不受起疑，想必在口音、方言、行為舉止都有一定程度的模仿才能騙過會館內的山西人。又，既然能扮作喇嘛，並捏造出似是而非的故事，想必鄭氏內部已經對塞外的狀況、喇嘛等有所瞭解，結合順治 12 年丘賢一行人中，有人在山西即離開從事其他任務一事，可知鄭氏諜報網絡的深入不僅及於土司地區，也對塞外有所認識。再者，侯觀郎最初的謊言中包含了南苑的事情，既然能提及此事，想必是對此處有基本的認識。綜觀鄭氏成員中，當年鄭芝龍頻繁出入南苑，或許是故而得以讓鄭氏間諜捏造出此謊言。最後，侯觀郎數次說謊的口供明顯是要誤導清廷，也確實成功讓清廷將杜永和緝捕到北京。雖然侯觀郎表示他之所以栽贓杜永和，是因為與之有仇。然而，倘若仔細觀察杜永和，將會發現這樣的栽贓並非毫無目標性。杜永和，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曾是南明李成棟麾下第二號人物，曾任豫國公、總督兩廣等職，後來以瓊州投降靖南王耿繼茂。當侯觀郎到廣州時，杜永和擔任靖南王麾下總兵官，是當時清廷方面難得的水師將領之一。後來隨靖南王移駐福建，並於康熙元年到 6 年（1667）病逝前擔任福建右路水師總兵，負責對鄭氏的作戰。⁴⁶ 換言之，杜永和是當時靖南王麾下精通水戰的重要將領，對於以水師作為屏障的鄭成功勢力而言，清廷中倘若有如此人物，勢必是鄭氏欲除之而後快的阻礙。因此，侯觀郎的指控或許也是出自間諜擾亂的敵後工作之一。

鄭氏進據臺灣後，以域外海島對帝國的諜報網仍未潰滅。所謂の間諜工作，除了前述刺探諜報、擾亂敵人外，更包括了敵後工作，例如行刺。順治 18 年 7 月 3 日，鄭成功派南京人陳阿五暗殺閩浙總督李率泰，因為他曾在李率泰家住過。陳阿五從廈門與六人在漳州潯尾登岸，領頭的人叫楊啟明，六人分頭執行任務，至於每個人執行甚麼任務，彼此並不知情，但楊啟明要求眾人於同年 12 月 22 日必須回到潯尾，因為屆時船隻將在此等候搭載眾人返回。陳阿五雖然成功以投誠

⁴⁵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2 冊，頁 278-297。

⁴⁶ 邵廷采，《西南紀事》（文叢第 267 種，1968；1689 年原刊），卷 9，頁 5-7；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7，頁 130

名義住進李率泰家中，但由於李家人數眾多無法下手，最終放棄行刺，逃離福州北上。陳阿五北上浙江和南京等地方遊走，會見其舊識，最後卻因偷竊失風被抓。被捕後，陳阿五在供詞中曾向清廷告知在海上時，知道鄭家大將馬信的心腹「甘相公」常在南京一帶探聽消息，他也曾找到這位負責這一帶消息探聽的「甘相公」，希望獲取一些盤纏。「甘相公」多次往來臺灣和江南（基本上是從寧波搭船返回臺灣），不僅多次傳遞消息或指派任務給位於這一地區の間諜，也曾替臺灣的人購買貨品。⁴⁷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根據時常接觸「甘相公」者的供詞得知此人「字君智」，但從未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此處「甘相公」與先前提及的「李相公」、「潘太監」是類似的稱呼，均是在某一地區負責探聽情報者，甚至可能負責統籌該地區的活動，但罕有人知道其真實姓名。

當鄭氏據佔臺灣後，其諜報網絡除在江南地區活躍外，也在帝國中樞的北京活動。康熙 5 年（1666）5 月 13 日，晉江縣人羅元（lo yuwan）因其祖羅士（lo si）被洪士銘所殺。8 月時，與其父羅安平（lo an ping）一起前往京城，會見洪士銘的女婿「曾姑爺」，⁴⁸ 至於這次拜會的理由為何，不得而知。然而，羅元隨後被留在京城，並在隸屬鑲黃旗下固山額真劉之源底下的洪士銘處辦事。⁴⁹ 同年 10 月 28 日，鄭成功長子鄭經派遣曾姓人士到京城，送信給洪士銘，並與之商談。羅元撞見此事，因而被捆綁在樹上、並塞住嘴巴、吊了半夜，因為擔心事跡敗露，羅元一直被監禁在府中。直到 11 月 11 日，羅元和其二弟趁機逃離洪士銘家中。⁵⁰ 雖然不知道鄭經與洪士銘間的通信和談論內容為何，但明顯鄭氏仍有辦法派人渡

⁴⁷ 此案件涉及複雜的事件，陳阿五曾在蘇州、杭州、黃岩等地流竄許久，會見許多的舊友試圖獲取金援，陳阿五的主人顧南金是鄭成功的顧問，此時人已經在臺灣，但仍派人到蘇州、杭州採買相當多的什貨。最後陳阿五在鎮江因為偷竊一頭驢子被逮捕，整起事件才因此曝光。參見安變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2 冊，頁 351-365。

⁴⁸ 洪士銘妻子林氏為林欲輝之女，根據其墓誌銘，洪士銘有女 2 人，分別嫁給丁思孔次男和丁煒長男，並無嫁給曾姓者。然而，也有可能是洪士銘其他妻妾所生的女兒或是姊妹嫁給曾姓者。參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63 冊，頁 153。

⁴⁹ 劉之源擔任鑲黃旗固山額真，直到康熙 4 年 7 月才退休致仕，而洪士銘隸屬的劉之源固山下同時也是當年鄭芝龍隸屬之處。換言之，鄭芝龍與洪士銘不僅在身為民人時是南安同鄉，就連成為旗人後，也是隸屬同一佐領下。參見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16，頁 2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丁編》，第 1 冊，頁 88。

⁵⁰ 羅元後來於康熙 7 年 12 月 3 日，在山東濟南府被知府劉芳聲抓拿，交付審訊。參見《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登錄號：167271-006。



圖一 鄭氏情報網絡據點圖

說明：圖一上之位置均來自本文所引檔案，因篇幅關係，過小的據點不標出地名；同理，太過小的位置也因會與較大的地理名詞重疊，而無法一一顯示於圖中。實際上根據檔案中提及的據點，大概可以發現這些據點遍布於水路交通要道，或是大運河上、海岸港口、鄰近河流的城市，或與許多間諜多以商人作為偽裝有關連。

繪圖者：盧正恆

過大海前往遙遠的北京城與重要人士會面。洪士銘，洪承疇之子，順治 12 年進士，因其父之故，受到清廷的特旨超陞，從儀制郎中一路陞遷到太常卿。⁵¹ 如此深受「國恩」者，很有可能是當年由鄭家間諜陪同北上京城的「洪經略之子」。然而，意外的是這次事件似乎無疾而終，洪士銘似乎沒有被嚴格地處罰，雖然不知是否仍為官，但至少有關官場仕紳的網絡明顯未斷絕。康熙 16 年（1677）袁

⁵¹ 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晉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8，頁 73；王士禎撰，《池北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頁 55-56。

悼殉國的范承謨所寫的〈天道歌〉也被一併收於《范忠貞集》。⁵²

簡言之，鄭氏諜報網的間諜雖然彼此直屬於不同的主人（例如鄭成功、鄭芝龍、鄭母等），互相獨立，但某種程度卻又彼此關連（例如丘賢、丘尚兄弟一人為鄭母所派、一人為鄭成功所派等）。據上述各個案例而言，鄭氏諜報網的據點、設施、金錢（例如鄭芝龍的當舖）及暗語似乎彼此互通（例如圖書與煙），且有準備相當完善的偽裝（例如侯觀郎的行為、謊言），並從事不同的敵後工作（例如打探消息、擾亂情報、暗殺）。在清帝國有效控制的中原本土範圍中，包含直隸、山西、湖廣、廣東、江西、江南、浙江、福建等地都已被納入此諜報網絡內（參見圖一）。⁵³ 並且，對於彼此的任務均無所知（例如黃傑和丘賢、陳阿五一行人等），甚至連真實姓名也不清楚（例如李相公、甘相公、潘太監等），這樣的情報分工完善，促使這群南北往來、東西奔波的間諜，在探知消息或執行任務時，替鄭氏這個位處海疆一角的勢力提供帝國擴張的行動資訊。

四、大清帝國的海島地理認識與《臺灣略圖》

前述的討論聚焦在鄭氏建立的諜報網絡如何運作；換言之，這是邊區對帝國的認識。⁵⁴ 在通訊科技發達前，攫取資料和情報是相當繁瑣和複雜的過程，然而

⁵² 范承謨撰，《范忠貞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9，頁3。

⁵³ 又例如鄭成功攻打南京時，也曾派出間諜到江西一帶，參見黃德溥等修、褚景昕等纂，《贛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27，頁24。

⁵⁴ 在「帝國史」的研究脈絡中，「帝國」並非總是透過強大的軍事能力使其治權能對涵蓋的區域擁有絕對和有效的統治；相反地，帝國應該是代表一個主體（subject）作為宗主國或核心，其有系統性的統治模式受到邊區與同時間國際上鄰近政治體的接受。在此概念下，帝國應該是指「帝國社會（imperial society）」直接或間接有效統治「附屬社會（subordinated society）」的關係，而統治並非一定是軍事性的，可以是政治合作、經濟、社會或是文化依賴。因此，帝國史研究中有所謂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即是透過與已存在的政治力量合作，統治的力量並非完全控制在帝國手中，政治中心不以兼併的方式控制獨立政治體的內外事務，從屬的邊區並非殖民地，而是獨立的附庸國、不穩固的盟友、或是從屬國。相反地，所謂的「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則是可視為透過軍隊、兼併領土並指派官員統治的殖民政權，然而這樣的帝國也仍需與當地社會合作，但統治權力仍是掌握在帝國手中。參見 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21, 30, 45;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10-11; Julian Go,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

清帝國會嘗試透過各種管道來取得消息，對待歐亞大陸即是如此。一如孔令偉研究十八世紀清帝國透過商人獲知中亞情報，清帝國積極且主動的獲知歐亞大陸的域外情報，企圖瞭解各地的政治局勢，藉以認識清帝國並非封閉，而是開放。⁵⁵ 來自遙遠東北地區入主中原，雖說清帝國能透過明朝留下的資料，也能藉由福建當地住民、官員獲取海島資訊，但位於北京的清帝國中樞對於遙遠的海島以及域外的臺灣所知仍有限。因此，在朝向南方拓展的過程中，清帝國必須把握機會探知在鄭氏控制下的沿海島嶼。本節將透過鄭氏間諜的口供、清帝國的諜報刺探，以及鄭氏降將提供的訊息等，論述在清代文人透過旅遊文學展現臺灣的地理想像（imagined geography）之前，北京的清帝國中樞已經透過諜報網絡和間諜，發展出對沿海海島、域外臺灣的「地理認識」。⁵⁶

從順治3年到康熙22年（1683）征服臺灣，這段期間帝國對東南邊區的認識主要透過鄭氏諜報網、派出間諜探知消息、與最重要的透過鄭氏降將提供。首先，當鄭氏諜報人員被捕審訊時，這是北京中樞獲知消息的重要機會。例如順治13年被鄭芝龍之母派往北京探知鄭芝龍生死消息的袁彩雲被捕後，在審問時，清廷官員除了訊問他為何事而來、如何到來、打探到甚麼消息之外，也期待從這名間諜口中探知重要的情報。根據訊問，當時清帝國最關心的情報有二：其一，海島的位置；其二，鄭氏主要成員的所在地。由於袁彩雲曾表示鄭母因故搬遷到金門，而他也是由金門出發，因此帝國中樞的官員們訊問了「金門」所在的位置。顯然，地方或許對金門有所認識，但帝國中樞對金門的位置仍不熟悉，因此先是詢問「陸路還是在水中」；接著詢問「金門」距離安海和廈門之間的里程。袁彩雲表示：金門在海中，到安海半日、距廈門順風一日、到海澄順風半日。又，官員接著訊問鄭母到金門，是自己過去還是被鄭成功接去？這樣的探問，實際上是清帝國想知道的是當時鄭母是否已跟鄭成功達成合作的協議，如此一來，將能夠瞭解鄭成功是否已統合並接收了鄭芝龍留在南方的所有遺產、勢力。根據袁彩雲的供詞：「太夫人到金門是因為四老爺鄭鴻逵恐大兵一至將被查斬，因此接去暫

⁵⁵ 孔令偉，〈1724-1768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北京）2018: 2，頁27-48。

⁵⁶ 鄧津華也是建構在「新清史」的脈絡中，即是屬於帝國史研究中探知帝國對邊區的了解。參見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避。鄭成功跟太夫人不睦，不相往來。鄭鴻逵在白沙，距安海半日。」清帝國官員再三確認鄭母是被誰接往金門、又袁彩雲究竟是何人派來的。袁彩雲表示太夫人到金門所是被鄭鴻逵接去，並非因為安海城被鄭成功摧毀之故，而他真的是鄭母派來查探鄭芝龍跟鄭芝豹的生死。⁵⁷ 此次審訊，清廷不僅認識到鄭成功似乎仍與鄭母、鄭鴻逵有所嫌隙，因而仍未完全掌握鄭氏的所有勢力，更獲知鄭氏沿海重要據點—金門—的相對位置和距離。除了順治 8 年馬得功在鄭鴻逵、鄭芝豹幫助下突襲廈門、搶奪鄭成功家產外，清軍從未在康熙元年以前成功主動出擊攻佔福建與閩粵交界地區的沿海海島，包括廈門、金門、銅山、南澳等地。⁵⁸ 例如順治 14 年清軍曾試圖攻打銅山所，但卻慘敗而歸；直到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聯手，才在康熙 2 年（1663）10 月首次攻佔金門、廈門。⁵⁹ 換言之，縱使清廷手握明廷資料和福建官方對金門的瞭解，這些瞭解並無法轉換成更真實的消息，必須透過曾親身待過海島的鄭氏謀報人員獲取更確切的資訊。

順治 18 年，鄭成功渡海攻打臺灣後，清帝國即透過情報人員主動地探知這座海外孤島的消息，包括同年 9 月福建巡撫徐永禎派間諜吳佑潛入廈門在內，清帝國多次派間諜探查鄭氏在臺灣的狀況。這時有兩件情報是清帝國需要探知的：軍事與地理。關於軍事的部分，鄭成功曾在 5 月 5 日從臺灣派回 72 艘空船回到沿海島嶼，希望搭載剩下的兵丁家眷去臺灣，但因臺灣局勢不穩，暫時沒有出發。又聽說鄭成功與原住民關係模糊，由於帶去臺灣的二十鎮、二萬餘人，已被原住民或荷蘭人擊殺、水土不服或逃逸者超過半數。此外，雖然聽說：「臺灣土番人均已歸附，惟紅毛夷人不降」，⁶⁰ 但鄭成功為了在臺灣栽種廈門收買來的稻穀、粟、豆、麥，與原住民發生激烈的交戰爭奪耕地。同時，又有鄭成功操練「番兵」藉以補充兵員的傳聞。軍事傳聞之外，清帝國也對臺灣這座域外海島有了初次的地理認識。除了得知尚在包圍熱蘭遮城的鄭成功，已經改赤崁城為承天府（或太

⁵⁷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280-284。

⁵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閩海紀略》（文叢第 23 種，1958），頁 5-6；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49。

⁵⁹ 參見巴清監修，《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卷 106，頁 826、卷 70，頁 551；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10，頁 163-164；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1 冊，頁 49。

⁶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2 冊，頁 549-550。

平府)，澎湖則為順昌府、熱蘭遮城則改為東都永慶府外，根據消息，臺灣：「地域遼闊，與浙江普陀山隔海相望，然僅有二城，他處並無城堡。」並得知臺灣大約一個省大。⁶¹ 根據鄧津華對於清初臺灣疆域認識的研究，這種將臺灣與中國本土相連接的論述，包括與浙江普陀山隔海相望，是一種建構臺灣屬於中國地理延伸的說法。但，根據軍事情報要求的準確性而言，這更有可能是依據當時的針路以及清初的臺灣船時常寄港於普陀山，所提供的合理的地理認識。⁶²

鄭成功去世導致鄭氏內部人心惶惶，大清的福建總督李率泰也馬上採取應對措施，「一面會題奏聞，一面與靖南王會商，率標兵速往沿海，暗遣細作，相機調度。」⁶³ 並且獲知，駐守臺灣、自稱「護理」的鄭襲（鄭芝龍五子，鄭成功幼弟）和據守金、廈自稱「世藩」的鄭經互鬥，最終鄭經獲勝成為接班人。⁶⁴ 此段時間，不少鄭氏將領陸續投降清帝國，他們雖然不屬於間諜，也是清帝國獲取情報的重要來源之一。例如康熙4年9月17日，都督朱瑛率眾投降浙江總督趙廷臣，朱瑛除了再次提供臺灣的地理認識：「臺灣城列炮三層」外，也報告臺灣各鎮的駐紮位置和將官。更重要的是，由於不能僅有口述，朱瑛因此繪製地圖供康熙皇帝「留圖朕覽」。⁶⁵ 有學者認為，這份地圖即是《臺灣略圖》。

鄭喜夫與林士鉉分別在2006年和2012年，各以專文分析收藏於國立故宮博

⁶¹ 此時，清帝國也知道鄭成功在沿海仍有駐紮：忠振伯洪旭、前提督黃廷駐廈門，翁總兵駐鼓浪，忠精伯陳輝守青浦，林總兵守海門跟海滄，右鎮林順守高崎和浯通，左鎮黃昌和右鎮黃元守圓頭跟同安澳，陳文達、張煌言、阮毅仍在北路，忠勇侯陳豹守南澳，左提督翁天佑和仁武鎮康邦顏守銅山，錦舍和族官鄭柱守金門。參見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2冊，頁195-198、268-271。

⁶² 當時從臺灣到日本的船隻，確實會停靠普陀山，因此這樣的描述並非單純是「地理關聯」的做法，而確實是針路的路徑。參見鄭瑞明，〈清領初期的臺日貿易關係（1684-172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臺北）32（2004年6月），頁53-58。

⁶³ 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5冊，頁29。

⁶⁴ 根據一名清軍哨兵打探的消息，鄭成功去世後，鄭經的部隊在沿海搶劫，並在廈門大造戰船，招募兵丁，每人每月給銀五兩。並稱康熙元年10月，周全斌隨鄭經回到臺灣，登岸後往見其叔「襲爺」，鄭經於臺灣自稱為「世藩」，臺灣所屬文武各官旗子均更書為世藩屬下。周全斌則被任命為五軍總制。12月，鄭經與周全斌返回廈門，康熙2年1月25日抵達廈門，臺灣仍由襲爺管理。2月1日，廈門也更旗幟為世藩屬下。鄭經之叔鄭泰不再主導辦理軍務民事，洪旭管理官兵、黃廷去銅山防守，鄭經因此接掌整個鄭氏勢力。參見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2冊，頁451-453。

⁶⁵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3冊，頁234-236。

物院的《臺灣略圖》（參見圖二），並論述此圖與朱瑛有密切的關係。⁶⁶ 雖然康熙 4 年朱瑛確實曾獻圖給康熙皇帝，但根據《臺灣略圖》上標示的文字，實際上能大致瞭解該圖的繪製時間。首先，鄭經是此時的世子，換言之時間在 1662-1681 年間；再者，此時統帥鄭氏五軍者為洪旭，因此時間又可限縮在康熙 3 年（1664）正月後前任總管五軍的周全斌投降前；再來，由於圖中「國師」是康熙 3 年去世的盧若騰，因此此圖的編繪時間為周全斌投降、洪旭接掌五軍事務和同年盧若騰去世之間。最後，此圖中海壇島與金門、廈門的繪製有極大的落差，因為海壇島要等到康熙 19 年（1680）被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攻陷後，才納入大清領地，但金門和廈門在康熙 3 年已被清軍攻陷，也因此原先主要駐紮金門、廈門的鄭經才會移駐洪旭統領的臺灣。透過這些資訊，將能知道此圖的編修資訊理當停留在康熙 3 年正月周全斌投降後，3 月鄭經、陳永華將天興、萬年改縣為州之間。因此，雖然朱瑛確實有獻圖之舉，但因為此圖所呈現的是 3 年 3 月前的資訊，隔年 9 月朱瑛理論上應已知天興、萬年改縣為州、盧若騰已死的消息。倘若此圖為朱瑛所獻，不該有這些誤植。若此圖非朱瑛所呈，那該是何人所主導繪製？康熙 3 年 2 月投降的周全斌很可能是主導者。由於他投降時仍不知曉盧若騰已死、改縣為州等異動，因此地圖上的資訊仍停留在康熙 3 年 2 月。雖然地理的相對和絕對位置都錯誤，但關於軍隊部屬和行政安排等內容極其豐富、詳盡，且有相當多細緻和關鍵性的內容，鄭氏政權內或許僅有少數人有這些豐富的知識，而周全斌在投降前正是全權掌握鄭軍在臺灣大小事務者，且他也有隨鄭經渡臺攻打鄭襲的經驗，因此他是最有可能提供如此詳盡知識者。

周全斌，金門人，順治年間即追隨鄭成功，不僅是其麾下大將，更擔任其親軍武衛，統轄的軍隊被稱為「戎旗兵七千，皆衣金龍甲，軍威甚盛」。⁶⁷ 康熙元年 3 月被鄭成功從廈門派往攻打立場不定、駐紮南澳的陳豹，鄭經則提供 500 艘戰船給周全斌。周、陳雙方雖然曾有短暫交手，但陳豹隨即在許龍的幫助下撤離，周全斌因此取得南澳。同年 10 月，周全斌幫助鄭經渡海擊敗鄭襲，成功奪權，

⁶⁶ 林士鉉，〈任教巨舶難輕犯 天險生成鹿耳門：院藏滿、漢文《臺灣略圖》簡介〉，頁 40-48。《臺灣略圖》廣為人知，學界已有不少研究關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也曾以〈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為名介紹該圖，參見〈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資料庫，下載日期：2018 年 11 月 17 日，網址：<http://thcts.ascc.net/themes/rb04.php>。

⁶⁷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文叢第 24 種，1958；1913 年原刊），卷 2，頁 43。

並且被任命為五軍，總管鄭氏事務。12月，他與鄭經一同返回廈門，自此鄭經完全掌握鄭氏勢力，全面「易幟」為「世藩」旗號。同時間，鄭泰（鄭芝龍堂侄、鄭成功堂兄）私下欲降之事被鄭經探悉，因此周全斌等人監禁了鄭泰，並將福建總督李率泰私下遞交的招撫信件轉交給鄭經證實自己的忠誠。康熙2年5月，清軍下令群集於潮州地區的諸位總兵如吳六奇、蘇利、許龍等人準備渡海攻打駐紮南澳的周全斌。同年10月，金門、廈門被清荷聯軍攻陷後，位處廈門的鄭軍四散，周全斌轉移到南澳，並與駐紮福建的靖南王商談投降之事。最終，周全斌於康熙3年2月棄守南澳、從銅山投降清軍，獲授為三等承恩伯。⁶⁸相較於施琅在攻陷臺灣前從未「親歷臺灣」、朱瑛僅是鄭軍的一位都督，且二人均未在鄭氏內部擔任過總管所有事務的經驗，周全斌不僅曾是五軍總制，更是親歷臺灣者，因此能提供清廷詳盡的資訊。

周全斌投降後，清軍已經擁有龐大的水師將領，因此以施琅為主力的清軍水師多次嘗試從金、廈渡海澎湖，進攻臺灣。例如，康熙4年3月23日辰時入海啟程，部隊以施琅為主帥，周全斌為副將，其餘鄭氏降將楊福、林順等人也參與。然而，風向不對，幾乎無風，28日返回料羅灣。這已是施琅繼去年10月不能渡海後，再次失敗。前回因北風凜冽，今回因無風和南風突至。⁶⁹施琅和耿繼茂分別提出關於3月失敗渡海的報告，二人的報告均指出：

不料二度出海遠征，均受風濤所阻，臣等實屬失職，難逃法外。蓋臺灣乃遠洋絕島，狂風惡浪，四時無常，水性難測，比之沿海，頗屬殊異。而澎湖乃通往臺灣之要衝，欲破臺灣必先攻取澎湖，澎湖雖有山巒，皆屬矮小，實難辨認。

⁶⁸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2冊，頁331-333、431-432、451-453、527-529；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3冊，頁3-4、38-43、69-71；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0，頁163-164、卷11，頁172、179、卷12，頁18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者獻類徵選編》（文叢第230種，1967），頁323-333。

⁶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3冊，頁210-213；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12，頁194。

此次失敗中，眾船隻不僅都飄往四方，施琅乘坐的船艦更一度不知去向。⁷⁰ 周全斌縱使妻子和部下都在臺灣，也曾在康熙 5 年 11 月被官員建議移往河南，但康熙皇帝仍以欽命令其留在福建，直到隔年才因清廷暫時停止攻打計畫，而與施琅等人一同被移往北京，周全斌則被編入正黃旗。⁷¹ 康熙 10 年（1671）2 月周全斌去世，康熙皇帝因其「自海外帶領戰船，率眾投誠功大」，特別允許其爵位得以再世襲一次，隔年 7 月由其子周公仁襲爵。⁷²

康熙 4 年 3 月的出師不利，造成了該年 5 月大清在福建地區的主要官員們的一場辯論，辯論大清是否該渡海拿下臺灣。較早投降的「遼人」代表，福建總督李率泰和駐守福州的靖南王耿繼茂認為：

剪除罪魁，盪平賊穴，唯有零星餘寇遠遁臺灣。……臺灣地方為紅毛夷人所佔據，乃為外疆也。今若遠征，勢必踏浪涉險。……古云：遠師勿渡，窮寇勿追。豈可冒風浪之險，征不毛之地？⁷³

因此，二人建議應該固守既有疆界，並將官員分派各地，不再進攻臺灣。明顯地，這二位封疆大吏無法說服康熙皇帝，因此康熙 5 年 5 月，皇帝派員從北京到福建詢問攻打臺灣與否的意見時，諮詢的對象即是曾經參加前一年作戰失敗的副將、同時也是最有經驗、最熟悉鄭氏底細的周全斌；周全斌的意見與李率泰、耿繼茂完全相反，他主張必須進軍臺灣剿滅鄭氏，並將臺灣歸還荷蘭作為條件，換取位於雞籠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和戰艦幫助。周全斌主張先攻取澎湖；但很可能因為前次從金、廈出發卻遇風失利的關係，周全斌規劃了另一要從相對南方一即是銅山、南澳一等甫攻佔的地區朝澎湖進軍的路線。很可能在此背景下，周全斌

⁷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3 冊，頁 215-230。

⁷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3 冊，頁 308-310；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 2，頁 44；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卷 224，頁 9165。

⁷² 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37，頁 516、卷 39，頁 523。周公仁之子周鳴岐於康熙 59 年因伯爵職位襲完，改襲三等阿達哈哈番。參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170，表 10，頁 5539。令人感到玩味的是康熙 12 年 12 月的朱三太子案中，原定在北京城內外同時起事，北京城內的奸細為鑲黃旗郎廷樞的家人黃裁縫和正黃旗周全斌另一子周公直的家陳益。事件曝光後，周公直舉發其家成為朱三太子一黨的聚集地，當清軍攻入周公直家中時，陳益等人更放火拒捕抵抗，最終陳益等人被擒獲，但楊起隆已經逃去。參見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44，頁 586-587。

⁷³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3 冊，頁 231-232。

將地圖繪製，並在5月回覆康熙皇帝的詢問時一併呈上此圖。圖中之所以金、廈二島的繪製未如澎湖諸島詳細，理由當是周全斌等人認為這些島嶼已在清軍控制下，因此僅需繪出大略即可。回覆康熙皇帝的同時，周全斌再次提供了臺灣的地理知識，表示臺灣雖然地甚廣，但「僅產五谷，山上多竹」，其他物產都是從內地過去。⁷⁴ 因此，施琅實際上有兩次從金、廈渡海襲擊澎湖失敗的例子，一次因北風過於強烈、一次則因南風突來。也許正因為這樣，康熙5年周全斌或諸位水師將領規劃從南方渡海澎湖的攻擊計畫才如此重要，而這也正是另一條渡海的航線。

因此，本文除了將圖中的漢文標示、滿文標籤臚出標示並翻譯（參見附錄一），更重要的是將此地圖中的地理標示和航線結合，本文主張這是康熙3年後曾為鄭氏總制五軍的周全斌上繳的軍事圖。這張軍事圖不僅僅暗示了福建諸位水師將領的進軍計畫，同時，清帝國的翻譯過程，以音譯取代意譯的行為，象徵著大清帝國對於邊區知識可能是類似接收，而非重建，並且在翻譯過程中體現了帝國的普世性。

本文推測此圖的資訊可能是周全斌所提供，除了上述的理由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此圖有關澎湖地區繪製的選擇，並非隨手選擇幾座島嶼，反而是體現了當時清軍的進軍計畫。《臺灣略圖》中，在繪製澎湖群島時，僅選擇了虎井、澎湖山、甘吉、將軍、崎山五座島嶼，這是相當值得深思的選擇。因為五座澎湖島嶼的絕對與相對位置完全錯誤，但這些錯誤並非無故。相反地，這五座島嶼很可能是當時對於大清水師們重要的地理標示。澎湖是從中國沿海攻打或前往臺灣的重要跳板，這五座島嶼即是進軍臺灣的重要據點。主要路線有二，其一是從金門、廈門一帶橫渡前往澎湖。根據明代《東西洋考》的記載，傳統上從中國前往澎湖的航線是從太武山起程，最後抵達「彭湖嶼」。⁷⁵ 這也是鄭成功渡海攻打臺灣的路線，順治18年3月1日鄭成功在祭江後，督軍會集於金門料羅灣，直到3月22日午時，鄭軍從料羅灣出海，24日齊到澎湖。⁷⁶

⁷⁴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周全斌已經建議將臺灣歸還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方面換取武力支持，二方面換取商業貿易利潤，這點也曾由施琅等人在康熙4年3月進軍前向耿繼茂提出。參見安變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3冊，頁194、261-265。關於這樣的提議，鄭維中曾在其著作中闡述施琅的類似提議，參見 Weichung Cheng, "Admiral Shih Lang's Secret Proposal of Returning Taiwan to the VOC,"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pp. 290-311.

⁷⁵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9，頁8。

⁷⁶ 彭孫貽撰、李延罡補，《靖海志》，卷3，頁15-16。

根據鄭維中對 1622-1636 年間，荷蘭船隻在中國沿海的水文調查和航行路線，從中國沿岸航向澎湖可粗分為兩條主要航線。第一條從廣東地區前往澎湖，可能的出發點包括澳門、田尾洋、平海所、南澳等地，通常是趁著南風或夏天時期；另一條則是從金廈海域、九龍江口等地橫渡前往澎湖，通常是靠著北風或冬季。荷蘭紀錄也顯示倘若從澳門北上不巧越過澎湖，必須立即停靠中國沿岸，因為將可利用北風南下澎湖。⁷⁷ 換言之，倘若清軍採取從南澳或銅山等相對南方的地區出發，將不至於有施琅等人從金、廈渡海失敗飄散的風險，而能夠趕緊向北方前進，進入沿海地區停靠。

清軍早已熟知這條從相對南方的路線，在鄭成功攻打臺灣的消息在大清水師間傳開。順治 18 年 5 月 17 日，駐紮潮州地區的南洋都督許龍就曾帶領百餘艘船謊稱為賣米船隻，本希望停泊由鄭軍陳豹控管的南澳島，但由於陳豹派人盤查，因此許龍只好駛入大洋，前往澎湖截擊鄭成功船隻。⁷⁸ 根據前述鄭維中對荷蘭船航線的考證，從南澳地方朝澎湖前進的針路是存在的，且確實也是在陰曆五、六月左右吹起南風時最是恰當航行的季節。

倘若要以此條路線進軍澎湖，那計畫成功與否就取決於南澳、銅山是否被清軍納入控制。檢閱史料後發現，康熙 2 年 5 月，清軍的吳六奇、蘇利、許龍等潮州地區的水師將領攻打由周全斌駐守的南澳。⁷⁹ 隔年 2 月，周全斌向靖南王商議降清一事。⁸⁰ 4 月，吳六奇、許龍、八旗都統吳天壽、李西庚等人負責和監督毀去南澳城的城牆。⁸¹ 康熙 3 年 2 月，清軍攻陷廈門後，即計劃攻打由洪旭固守的銅山。⁸² 換言之，《臺灣略圖》之所以可能是一幅軍事規畫圖的方證之一，即是這段時間銅山、南澳均已在大清掌握下。

⁷⁷ 逆風而行雖然是歐洲船隻的優勢，但不少荷蘭船隻這段時期也都遭遇無法逆風抵達目的地的困擾，例如 1622 年 12 月 7 日的格羅寧根號、14 日的哈倫號，都因為逆風的關係無法從中國沿海抵達澎湖，格羅寧根號更是在廣東沿海等待超過五個月後才靠著季風更改回到澎湖。參見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收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385-440。

⁷⁸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2 冊，頁 195-198。

⁷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2 冊，頁 431-432。

⁸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3 冊，頁 70-71。

⁸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3 冊，頁 76-78。

⁸²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 3 冊，頁 69-70。

回到前述的問題，為何周全斌挑選這五座島嶼繪製？首先，根據《澎湖廳志稿》，「臺郡往來船隻必以澎湖為關津，從西嶼頭入，或寄泊嶼內、或媽宮、或八罩、或鎮海嶼，然後渡東吉洋，凡四更船至臺灣，入鹿耳門。」⁸³ 因此，由於東吉嶼和西吉嶼即是「舟人所謂甘吉是也」。⁸⁴ 順治 18 年 3 月 27 日，大軍集結在甘吉嶼準備渡海攻臺。可惜「阻風而回」，鄭成功等待直到 30 日晚間，風雨仍未息，由於糧食已盡，因此大軍準備強行渡海，運氣不錯是三更後「晴霽風順」。4 月 1 日天明，鄭成功大軍陸續抵達臺灣外海，之後各船絡繹抵達鹿耳門外。⁸⁵ 由此可知，鄭軍行經的路線是從金廈海域前往澎湖，再從澎湖前往甘吉，從甘吉直向鹿耳門。由於此處為澎湖前往臺灣的重要指標，正因為如此《臺灣略圖》才將甘吉繪出。

那剩餘的四座島嶼為何被畫出？根據康熙 22 年施琅攻打臺灣是從銅山起程：「靖海將軍侯施，統率舟師，六月專征，由銅山直抵八罩澳、取虎井、桶盤嶼。」⁸⁶ 毛長齡在〈平臺灣記〉的序言中，就提到「一旦破澎湖、擣臺灣、由銅山、花嶼抵將軍大嶼。」⁸⁷ 此外，「六月乙酉，琅帥舟師由銅山開駕，令各風颿大書將弁姓名，以便識進退、定賞罰。丙戌到貓嶼、花嶼。是夜泊八罩水坵澳，遣官乘小哨到將軍澳、南天嶼等島，安撫居民。」⁸⁸ 因此，根據施琅的出征路線，同樣是從與南澳相同方位的銅山出發後，並先抵達花嶼（即崎山）一帶，派小船往將軍澳、攻打虎井一帶。換言之，周全斌所繪製的《臺灣略圖》上所存在的澎湖諸島嶼，符合了施琅之後的進軍路線。因此，康熙 22 年施琅實際行走的這條路線，則很有可能是康熙 5 年就已透過《臺灣略圖》規劃出來的。⁸⁹

根據康熙 21 年 4 月，施琅上奏表示鄭軍固守澎湖，且此時為冬、春之際，颶風的不穩定將使舟師難以渡海。因此建議：「臣見在練習水師；又遣間諜通臣舊時部曲，使為內應。請俟明年三、四月間進兵，可獲全勝。」康熙皇帝允諾後，施琅又表示：「夏至南風盛發，不可進兵；請至十月大舉。」由於這樣拖延，康

⁸³ 林豪總纂，《澎湖廳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7，頁 497-498。

⁸⁴ 高拱乾撰，《臺灣府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卷 1，頁 17。

⁸⁵ 彭孫貽撰、李延罡補，《靖海志》，卷 3，頁 15-16。

⁸⁶ 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頁 3。

⁸⁷ 余文儀主修、黃侑等纂輯，《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22，頁 3。

⁸⁸ 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卷 4，頁 62-63。

⁸⁹ 誠然，該圖中仍有「八斗」和「凹裡」（滿文作 wa li），雖不知確切地點為何，但根據本文的邏輯思考，這些地點應是當時具有軍事意義或水師進軍航行的地理標示，因此「八斗」或許是「八罩」。

熙皇帝與議政王大臣商議，要求姚啟聖和施琅「剋期於夏至後進取臺灣」。最後的結論是因為如此重要的事情，命令在地方的姚啟聖和施琅隨時審查「賊中情狀審察確實，如有可破、可勦之機，著協謀合慮酌行勦撫，毋失機會。」⁹⁰ 康熙 21 年 3 月，福建總督姚啟聖曾率兵離開定海嘗試攻打鄭氏，雖然史料中並未言明出征的地點為何，但根據航線，理應是攻打澎湖。可是因為「風不利而還」，施琅因而向姚啟聖說明，若要攻打臺灣，必須仰賴西南風期。⁹¹ 此事之後，施琅專任攻打之事，而姚啟聖則留在廈門備餉。由此可知，施琅此時已放棄了從金、廈出發的攻打計畫，改等待西南風，以期從南方進軍。⁹² 此計畫和《臺灣略圖》的呈現有相當吻合之處。

這幅《臺灣略圖》也許是在福建完成後送往北京，並在北京時，由中央官員將漢文描述翻譯成滿文。滿文的翻譯則讓這份圖呈現了超出原有軍事情報、進攻計畫以外的更深刻意涵，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了大清作為「普世帝國」的特質。⁹³ 此圖的滿文翻譯顯示出一種大清帝國希冀建立「普世帝國」的想法，但卻又必須先理解臺灣這座完全陌生島嶼的矛盾心態。或許由於翻譯的過程中，翻譯者並無法諮詢繪圖者，因此不僅僅顯現了鄭氏成員對臺灣的瞭解在遞交給康熙皇帝後，變

⁹⁰ 蔣良騏編，《康熙朝東華錄》（臺北：文海出版社，2006），卷 7，頁 17。

⁹¹ 曹剛等修、邱景雍等纂，《民國連江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卷 3，頁 49。

⁹² 實際上，康熙 22 年 2 月，姚啟聖嘗試進軍臺灣，建議攻打淡水後再襲擊臺灣，鄭軍的何祐派連間諜得知此事後，隨即在淡水修築城堡要塞。然而，倘若根據航線，要通往淡水必須從福州出發，清軍水師此時均在閩南地區，或許因此有某種程度的難度。參見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程祖洛等續修、魏敬中續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卷 268，頁 39。

⁹³ 所謂的「普世帝國」是在全球架構底下才能進行理解的概念，主要是指帝國正式或非正式控制或理解的範圍內，帝國統治者透過某種核心制度或經驗所建立起具有階級式（有時為不平等或壓榨）的關係。例如大英帝國即是一個以倫敦經驗、現代資本主義為中心所創造出來的普世帝國。最重要的是，普世帝國的核心概念是建構在一種階級式的統治權力，透過兼併或理解進入帝國空間範疇（不一定需要直接控制）的既有地方統治或領導階層，普世帝國的統治者則站在一個最高且超越一切的宗主地位，俯視著這些新納入的地區。縱使每個帝國間有所差異，但是諸如神聖羅馬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大英帝國、大清帝國都是屬於普世帝國的一份子。大清帝國的普世性質則可透過滿洲皇帝作為所有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的最高統治者端見。參見 Saree Makdisi, *Romantic Imperialism: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 157; Peter Fibiger Bang and Darius Kotodziejczyk, “‘Elephant of India’: Universal Empire through Time and across Cultures,” in Peter Fibiger Bang and Darius Kot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9-1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

成了清帝國初步瞭解臺灣的第一手資料，也可看出清帝國如何在翻譯這些資訊的過程中避免增加多餘的解釋。其中，《臺灣略圖》被貼上了 89 處標籤、約九十餘處地理資訊，雖然有部分標籤因為黏貼的關係無法完全辨識，但根據可識別的標籤，這個行為是將鄭氏降將的臺灣資訊轉化為帝國的知識（參見附錄一）。最明顯的是在某些翻譯上，帝國並沒有增加自己的解釋。許多滿文僅是「音譯」而非「意譯」。例如「只一大厝」被譯為 *jy i da ts'u*；「大厝」譯為 *da ts'u*；「武衛」、「虎衛」則分別被譯為 *u wei* 和 *hū wei*；「六察」譯為 *lu ca*；「先鋒」譯為 *siyan fung*；「大溪」譯為 *da ki* 等。甚至，「淡水」是指該地為「淡水河」、還是指該處有「可飲用的淡水」、或是「地名為淡水」，也因為僅是音譯為 *dan šui*，而無法得知究竟是三個意思中的何者；「烏鬼」同樣僅以音譯做 *u gui*。換言之，由於將漢文譯為滿文很大的可能性是為了提供北京中樞對於臺灣的初步認識。因此，這些音譯也許可視作翻譯人員無法再次徵詢提供知識者（例如周全斌等）的意見而誕生的知識呈現。

然而，《臺灣略圖》中同時呈現了「普世帝國」中階級性的名詞使用。由於圖中涉及許多原住民部落，在這些地區的滿文翻譯以「*fan i niyalma*（番的人）」，對於「番社」，則譯為 *fan i niyalma i ba*（番的人的地）進行呈現，這樣的翻譯選擇頗值得深思。一如何羅娜、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賴毓芝等人關於乾隆 16 年（1751）《職貢圖》的研究，雖然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解釋，但都或多或少同意該圖冊編修帶有區分「他者」的帝國普世性質。⁹⁴ 現有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滿文名詞之研究或材料大多呈現已經征服臺灣後，清帝國境下五個主要文化群體之描繪。⁹⁵ 蔡偉傑探討康熙 56 年（1717）、康熙 58 年（1719）和康熙 61 年（1722）三份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奏摺中，均以「番子（*fandz*）」描繪之。⁹⁶

⁹⁴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76-277, 327-336;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3, 47-49;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 (2012年3月),頁1-76。

⁹⁵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7-203.同樣的理論也曾被 Jodi Weinstein 套用在她的貴州研究中,參見 Jodi L. Weinstein, *Empire and Identity in Guizhou: Local Resistance to Qing Expans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p. 120.

⁹⁶ 蔡偉傑,〈殖民檔案與帝國形構：論清朝滿文奏摺中對臺灣熟番的表述〉,《臺灣史研究》(臺北) 15: 3 (2008年9月),頁25-55。

相較於征服臺灣後，清帝國或許因為政治、文化意涵的差異，又或者賦稅上的意義，而將臺灣原住民分為熟番（*urehe fandz*）、生番（*eshun fandz*）、及之後出現的歸化生番（*dahaha eshun fandz*）等三者。⁹⁷ 此外，莊吉發譯註的《皇清職貢圖》內，也呈現了與征服臺灣前，清廷對原住民在滿文用語上相當大的不同。在謝遂的《職貢圖》中，做為第一個被描述的臺灣原住民的大傑顛社，漢文寫道：「番民有生熟二種，聚居各社，如內地之村落，不設土司，眾推一人約束。」滿文的部分則寫作：「*fan i irgen i dorgi eshun urehe juwe hacin bi, esei isame tehe geren ba, uthai dorgi ba i gašan toksoi adali, kadalara aiman i hafan akū emu niyalma tukiye fi kadalabumbi*」。《職貢圖》將臺灣地區的「番民」寫為「*fan i irgen*（番的民）」，而非該圖中描繪西番地區的「*fandz irgen*（番子民）」或《臺灣略圖》上的「*fan i niyalma*（番的人）」。⁹⁸ 換言之，清帝國攻佔臺灣前，對於尚未接觸到的臺灣原住民自然沒有生番、熟番的區分，也不以番子（*fandz*）或番民（*fan i irgen*）稱呼之，而是以番人（*fan i niyalma*）稱呼。

此外，更重要的是，《臺灣略圖》中有一處相當值得討論的翻譯，相對於圖中充斥著「民社（*irgen i tehe ba*）」或「番社（*fan i niyalma i ba*）」，整份地圖中有一處「多吧噠土社」，是唯一以「土社」之名存在的聚落。雖然該處的滿文被遮蔽無法完全辨識，但仍可知「土社」被譯為 *tusy i ba*，即是「土司之地」之意。由於此時的大清已承襲元、明對於土司的制度和統治模式，因此此處的土司或許正意味著一種階級式的從屬關係。⁹⁹ 換言之，一如前引莊吉發所翻譯的《職貢圖》中，清帝國雖然在乾隆年間就明白表示臺灣從未設有「土司（*aiman i hafan*）」的官職；但在康熙初年《臺灣略圖》的翻譯上，卻運用既有的帝國知識，選擇以 *tusy* 來表示「土社」一詞。因此，這樣的行為可以理解成雖然此時臺灣並未在清帝國的統治下，但清帝國已某種程度上運用既有的帝國認知和「統治權階

⁹⁷ 關於清代對於臺灣番人分類的研究，現有研究相當豐沛，可參見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41-66；鄭瑩憶，〈仰沾聖化、願附編氓？康雍朝「生番」歸化與番人分類體制的形構〉，《臺灣史研究》24: 2（2017年6月），頁 1-32。

⁹⁸ 莊吉發校注，《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 191-217、305。

⁹⁹ 至少在順治 5 年（1648）時，清帝國已招撫大批土司，並且「准與照舊襲封」。且至遲在順治 8 年時，湖南地區土司就已經「各獻輿圖版冊、及元明兩朝印式來歸。乞授以原官、頒發新印。」參見巴清監修，《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卷 41，頁 330、卷 55，頁 437。

級 (hierarchies of lordship) 」的概念，來解釋並且翻譯臺灣某些處於鄭氏統治下原住民的部落為「土司」。此處對於這份「製圖學 (cartography) 」上的文字翻譯，可以和日後清帝國在中國西南邊區等地區的「民族誌」和「地圖」編繪相比較。換言之，某種程度上體現大清統治者已對「土司」展現「非正式帝國 (informal empire) 」的特質，以及身為「統治權階級」的最高領導者之地位。¹⁰⁰

簡言之，《臺灣略圖》是康熙3年周全斌降清後、康熙4年金廈渡海戰事失敗後，由周全斌所主導繪製的一幅軍事規畫圖。根據該圖的內容，這其實是一幅規劃大清水師可能從南澳、銅山等地出征，而非從金門、廈門海域出發，抵達澎湖後必須攻陷的重要地點之標示圖。換句話說，從這幅圖看來，當時大清南方的水師將領們，已根據中國水手、漁人過往豐富的航海經驗，更考量從前施琅多次從金、廈進軍澎湖失敗的經驗，已經大略有計畫將從銅山或南澳等地發兵。倘若上述的推論正確，那麼這幅地圖上的滿文字條，很有可能是福建地區以周全斌等人計畫攻取臺灣的資料被送往北京交由皇帝等人進行最終評估的呈現。繪製該地圖者並非「清帝國」，而是來自鄭氏的降將。因此，漢文版本的圖上資訊展現了鄭氏成員對於臺灣島的瞭解。簡言之，對於水師將領們而言，這是一幅期待能從相對澎湖南方之處攻打澎湖、臺灣的軍事標示圖。然而，當這幅地圖被送到北京後，對於清帝國而言，帝國核心面臨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在翻譯成滿文的過程中，避免誤譯，在某些部分並無額外增補新知或在水師將領提供的知識上進行改造、修正、重新詮釋，僅是單純地接收。然而，另一方面，卻也利用既有的知識，建構出了階級性的統治權，以「fan i niyalma (番的人)」、「fan i niyalma i ba (番的人的地)」分別指稱「番人」和「番社」，更將「土社」轉譯成「土司 (tusy)」，這樣的翻譯某種程度上體現清帝國的「普世性」。誠然，由於資料零星，無法直接證實清帝國朝廷究竟在順治朝對東南海島的地理有何認識、康熙朝對域外臺灣島有何地理認識。然而，根據目前的材料已可知清帝國確實在袁彩雲一案中，特別希望瞭解東南海島的位置、距離。當鄭氏攻打臺灣後，對臺灣情報的收集除了聚焦在軍事佈署外，更重要的是清帝國在片段的資料中已經構築出

¹⁰⁰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4;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pp. 10-12.

了初步對臺灣的「地理認識」：一個約有一省大寬廣的地區，但僅有兩座修築完善的城，通過海洋可連接直達浙江普陀山，雖然盛產五穀，但其他資源相對欠缺。

五、結論

雖然鄭氏家族並沒有如「五商」般具有名號的頭銜稱呼其諜報網絡，但鄭氏中不相屬的成員都曾派出分工精細和訓練有素的間諜，這些被清廷視為「奸細」的人雖然少被歷史記載，但是從調查鄭芝龍生存與否、軍事情報、暗殺行為等，他們對明清鼎革提供巨大的貢獻。鄭氏諜報網絡的細密分工及結構，幾乎每位間諜僅知其上下屬，而不明白全盤計畫或眾人的任務，且似乎不會有僅押寶一條線的狀況，而是數條線同時在進行，如此一來不僅可避免一名間諜被俘擄時，整個網絡崩解的可能，就算此線受阻，另一條線也可繼續進行任務。此外，事前就準備被逮捕後的口供、安排住宿與分配任務，或是透過栽贓嫁禍影響清帝國的軍事佈署。該組織不僅安插在清帝國中樞朝廷，更深入山西、湖廣，甚至是土司地區。

本文建立在被俘擄的鄭氏間諜所審訊供詞上。這些被清廷俘擄的間諜除了供出間諜的組織和運作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樣也是清帝國獲取海島資訊的第一手資料來源。因此，或許也能說清帝國和鄭氏實際上共用同一個諜報網絡。此外，清帝國確實也派員探知消息，並且從投降人員處獲取關於東南海島的地理認識，帝國藉此首次瞭解遙遠海洋上的地理狀況。

大清帝國從鄭氏方面接收到的資訊，征服前的認識一方面停留在全盤接收而非重新詮釋；另一方面也試圖從中展現帝國的普世性質。清、鄭對峙時，被俘擄的鄭氏諜報成員同時成為大清帝國獲取海島知識的重要來源。在此，必須強調，雖然對於域外的臺灣認識有限，但清帝國肯定從明代既有的官僚體制而對福建的海島地區有基本的瞭解；同時，派在福建的官員也可從各種管道知曉海島和臺灣。然而，本文所重視的是透過降將、諜報人員等曾經有海島或臺灣親身經驗的人員所提供的資訊。這些人體現的並非清帝國的價值觀，而是屬於鄭氏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卻在最後被帝國所吸收，進而轉化成知識。

過往研究已經詳盡討論清帝國對於臺灣的知識認識和文化建構，但是在鄭氏控制沿海島嶼和臺灣時，清廷無法透過派遣官員或文人到臺灣建構知識。當時雙

方互相理解的唯一管道充滿軍事性質，包括間諜和降將。在這樣特殊的軍事對峙過程中，清帝國逐漸對臺灣有了初步的理解，這些理解並沒有被加工處理，而是以原樣呈現。《臺灣略圖》即是在此狀況下，由「親歷者」周全斌繪製，雖然這是一幅修正康熙4年從金門、廈門出征澎湖失敗，既而修改從相對南方地區進軍的軍事作戰計畫圖，但因為周全斌既是鄭氏降將中官位最高者，也是有臺灣親身經歷者，他因此提供了詳盡的臺灣訊息。在北京，此地圖被轉譯為滿文，不僅毫無文化加工的痕跡，許多名詞直接從漢文音譯、而非意譯為滿文；同時，這也是首次清帝國理解臺灣原住民為 fan i niyalma；並且將「土社」譯為「土司」，略略體現了清帝國的普世性。

除了鄭氏對大清帝國的情報收集外，對於朝鮮、日本的情報收集也相當值得注意。例如鄭經前往日本的船隻停泊濟州島時，也會藉此與朝鮮有所交涉，尤其在三藩之亂時期，甚至派人與朝鮮聯繫。¹⁰¹ 此外，康熙5年曾有安南人向清廷舉發，當時後黎朝的鄭主與鄭經等系出同源，互相接濟。當然，後黎朝的鄭主不會跟鄭家系出同源，但是根據鄭氏降清官員史偉琦的供稱，雙方肯定有貿易關係。¹⁰² 雖然目前有零星材料，然而對於相關史料的處理和查找仍力有未逮，希冀未來能另文討論，以期在帝國史的脈絡下，不僅認識帝國和邊區的關係，更希望瞭解邊區與邊區間的關係。¹⁰³

無可否認，本文所利用的檔案過於零星，並不完整，在史料的運用上仍有其侷限性。然而，放觀全球歷史，甚少能如清、鄭對峙提供帝國史研究中，有關軍事諜報議題如此豐富的面向和資料。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被征服的抵抗勢力能留下的史料往往有限，或是受到帝國控制後的影響而多少有所改變。相反地，清、鄭留下豐富的材料不僅能提供學界對清、鄭間諜報網絡有所認識，更能進一步理解帝國和邊區在擴張時期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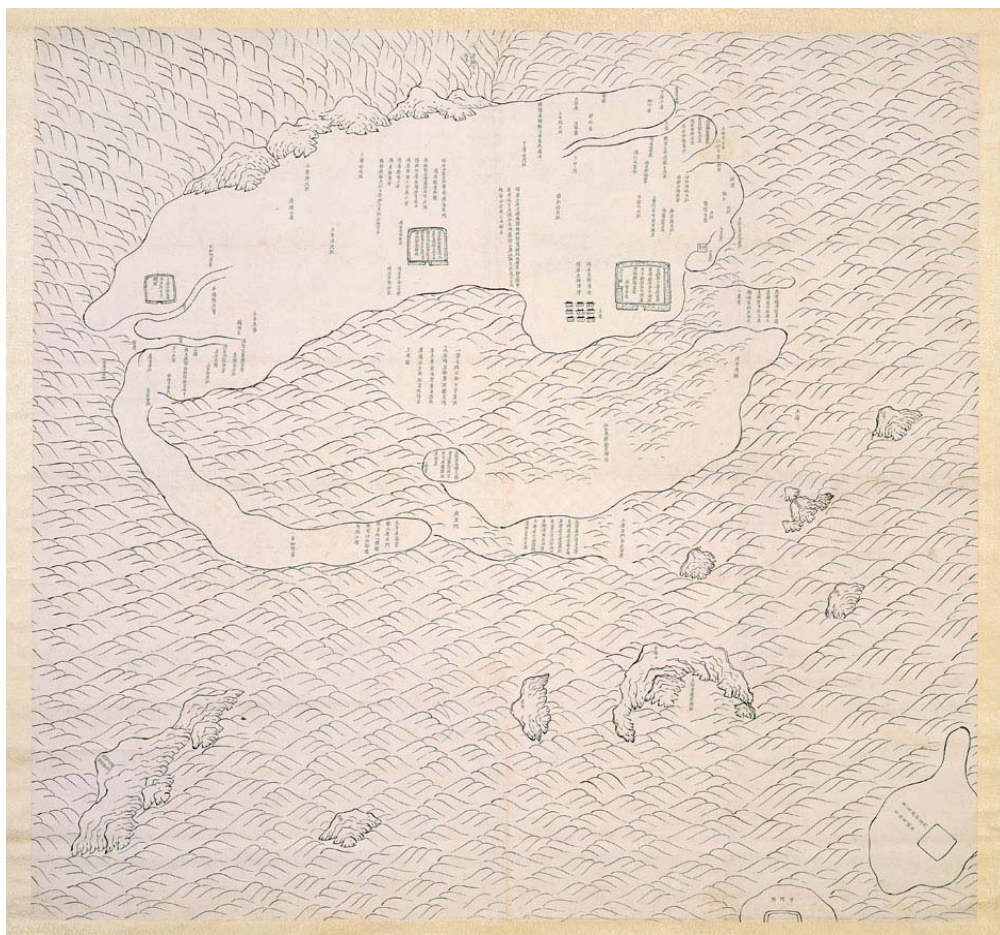
¹⁰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肅宗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55-1958），卷5，頁5、11、25。

¹⁰²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3冊，頁292-293。

¹⁰³ 此概念實際上是希望透過認識邊區之間的互動、情報傳遞的頻繁與交換，除了認識帝國核心為中心與邊區雙向互動外，同時邊區本身並非彼此隔絕。相反地，邊區之間的互動甚為密切，透過這樣的認識來修正帝國史學者 Karen Barkey 以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情況所發展出的「軸幅模式（hub-and-spoke model）」。¹⁰³ Barkey 的論述認為，帝國建立這樣的模式有助於有效的統治，因為將限縮「幅」之間的互動。參見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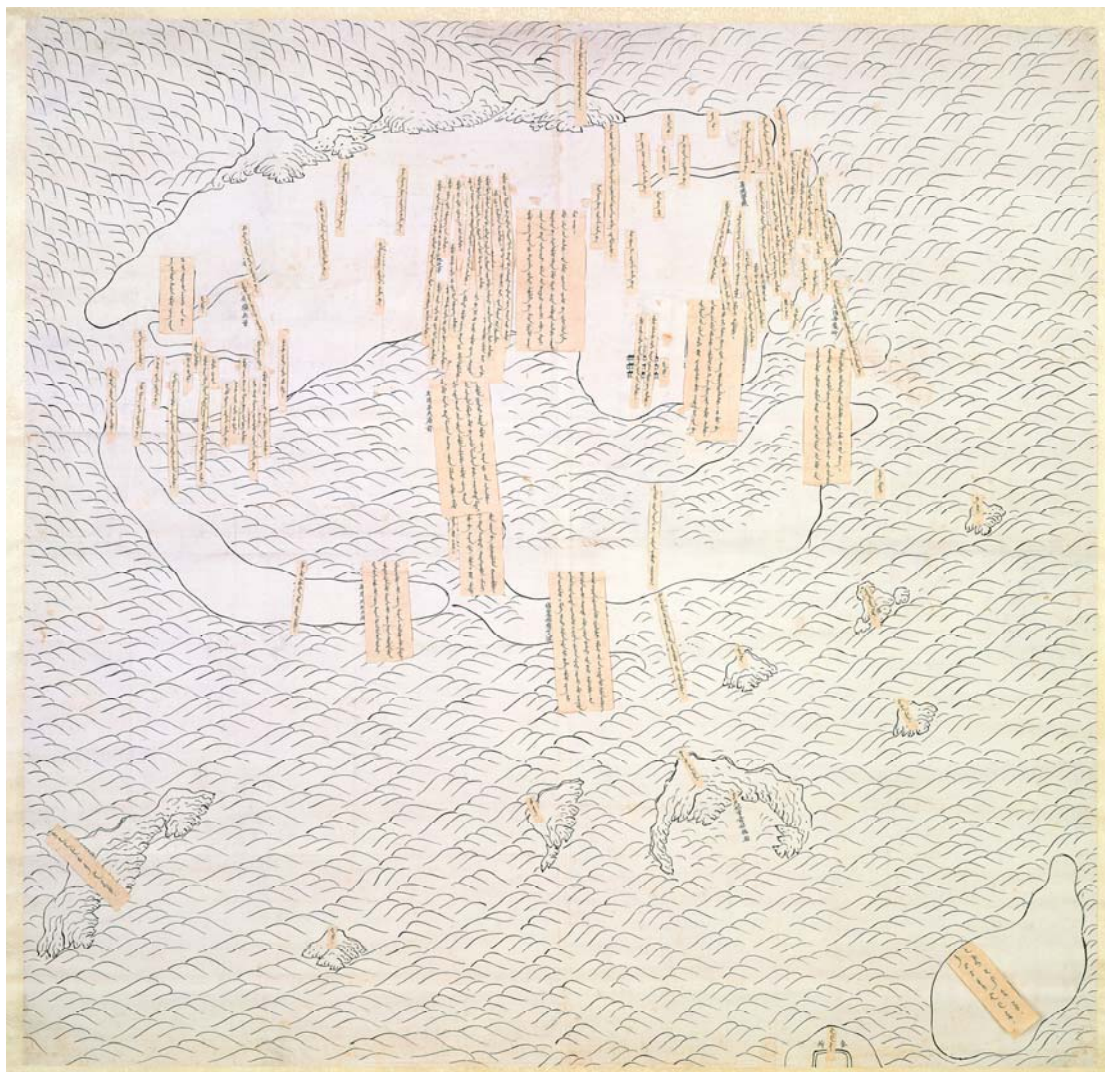
附錄一 《臺灣略圖》滿、漢文標記

本附錄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之《臺灣略圖》中漢文標出、滿文標籤轉譯並翻譯成表。然而，因為滿文標籤的版本黏貼相當複雜，倘若再將編號標於圖上，將會造成版面混亂不堪。因此，本文將從權使用漢文版本為底圖進行製圖，並將該圖分做七大區塊，逐一標示，成果將呈現於附表一之中。期待藉此機會能有系統地將這份地圖之滿、漢文標記做最大努力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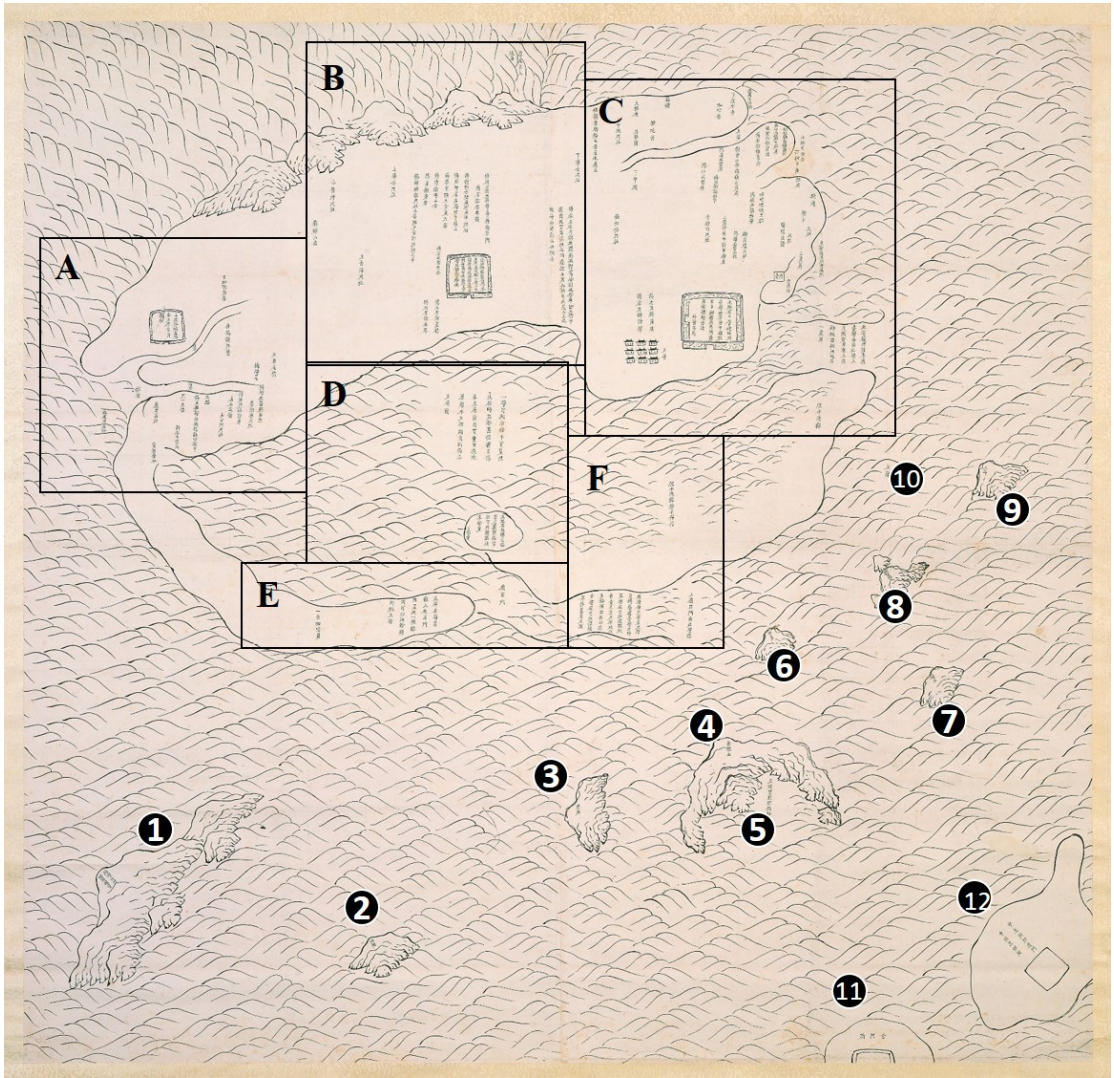


圖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灣略圖》漢文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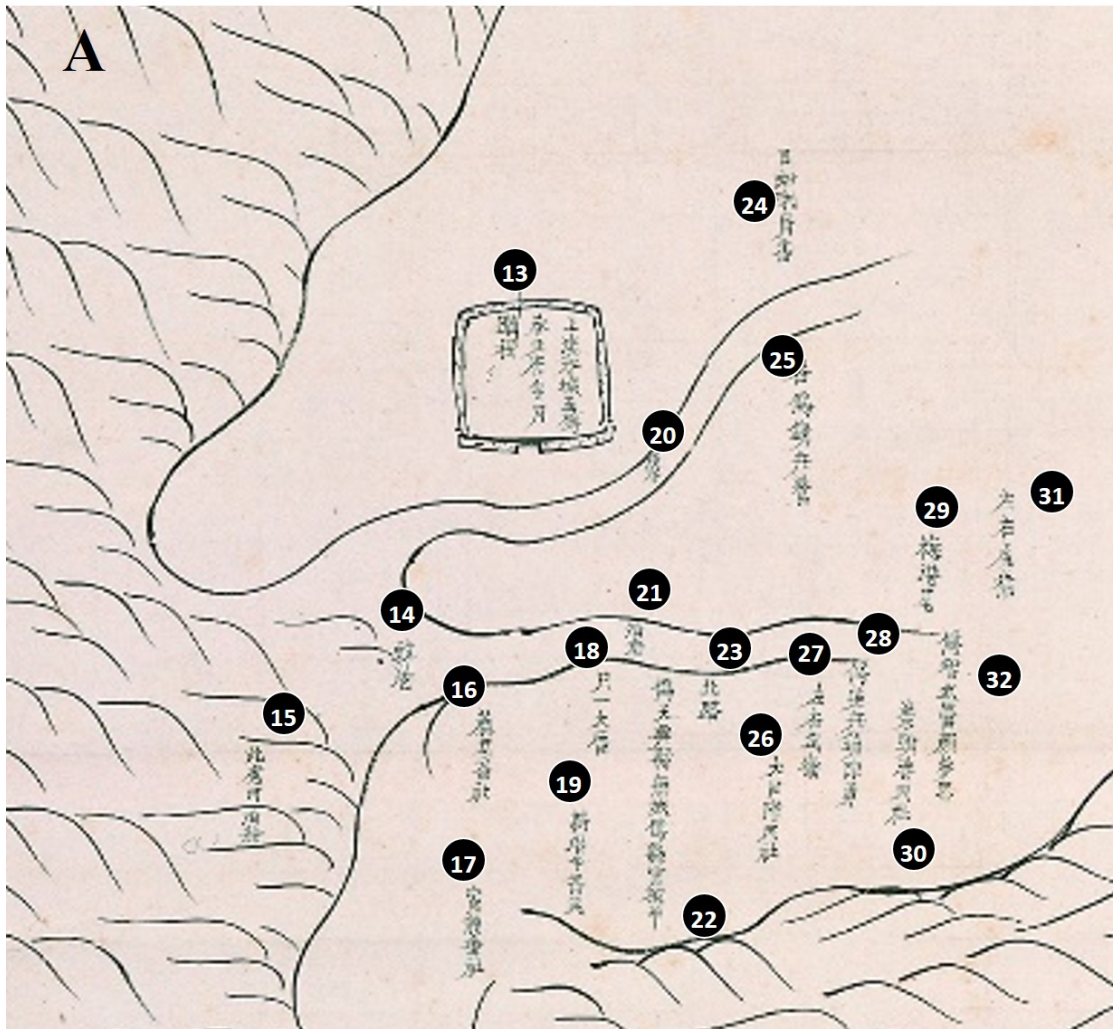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下載日期：2018年11月17日，網址：https://www.npm.gov.tw/exh101/books_archives/index.html。筆者已經獲得故宮授權該圖檔，特此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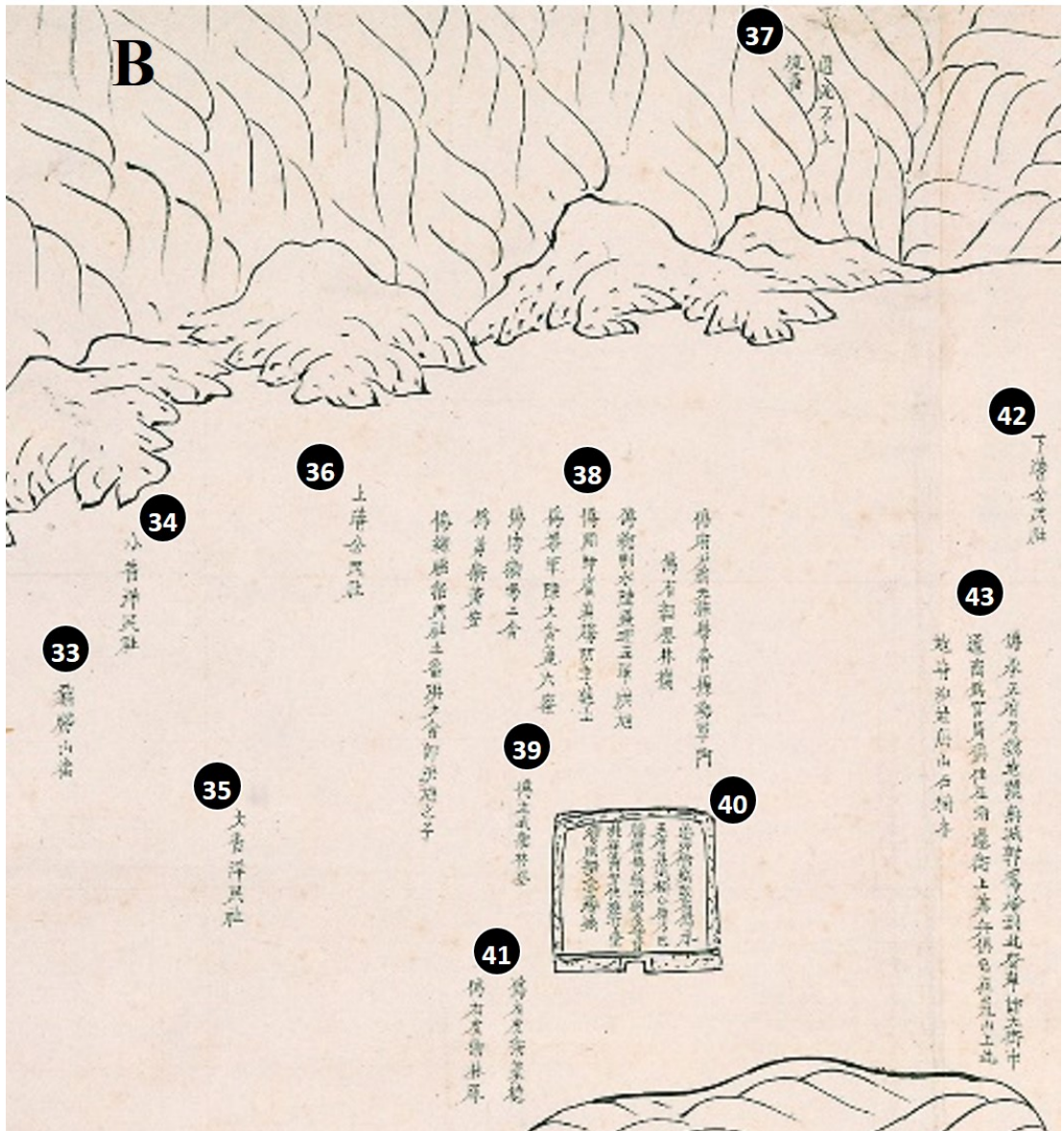
圖三 《臺灣略圖》（滿文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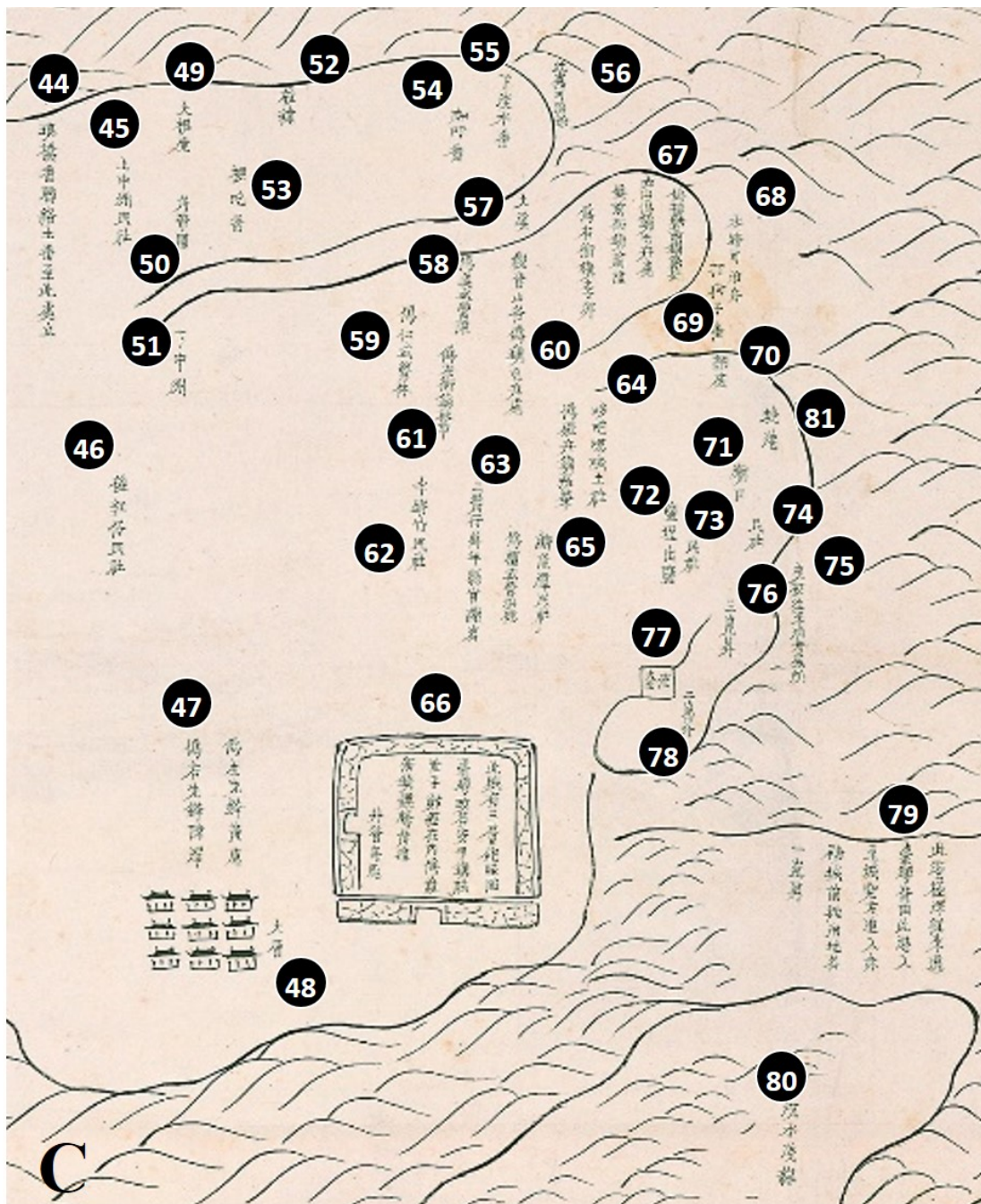
圖四 《臺灣略圖》（漢文版本）與區塊區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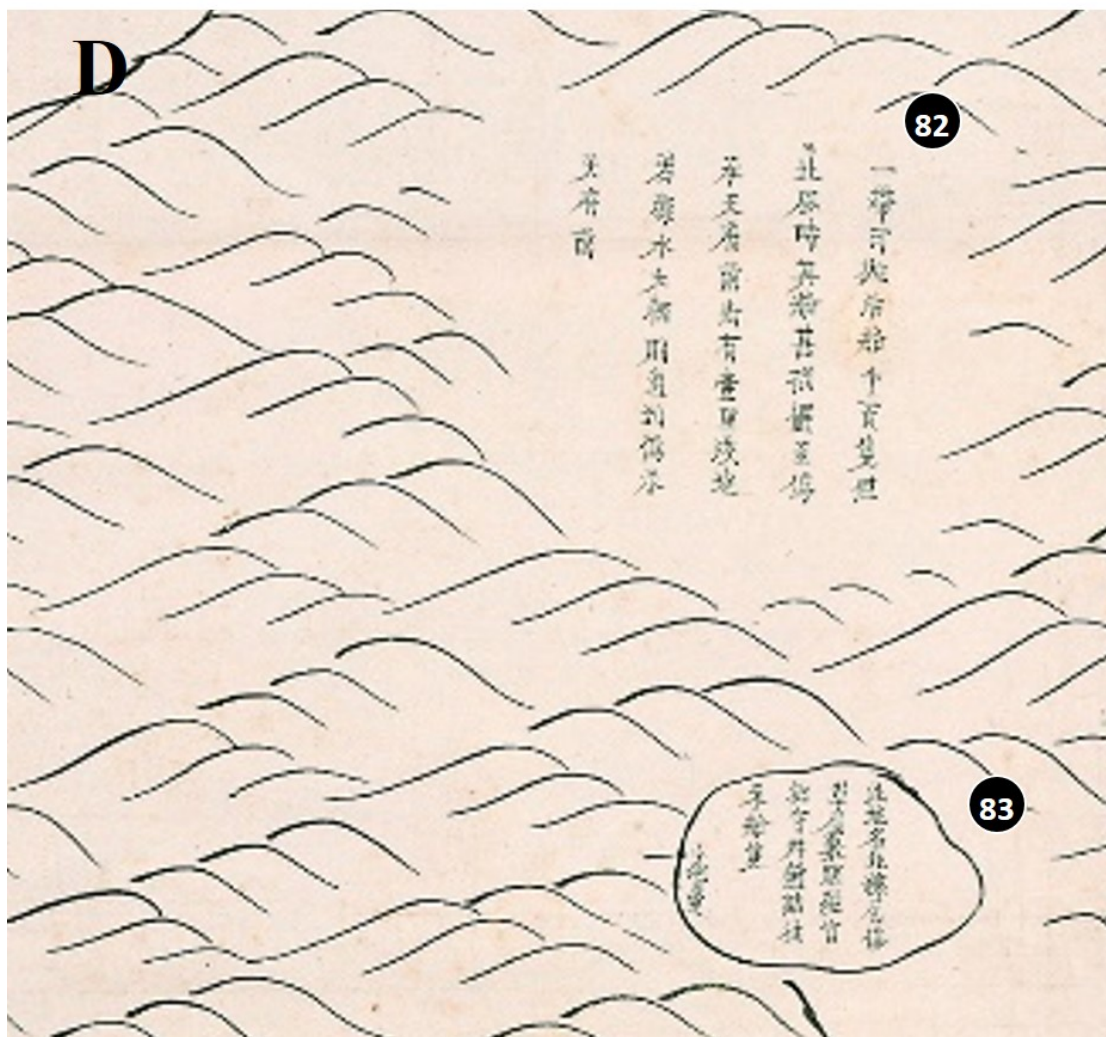
圖五 《臺灣略圖》之區塊 A



圖六 《臺灣略圖》之區塊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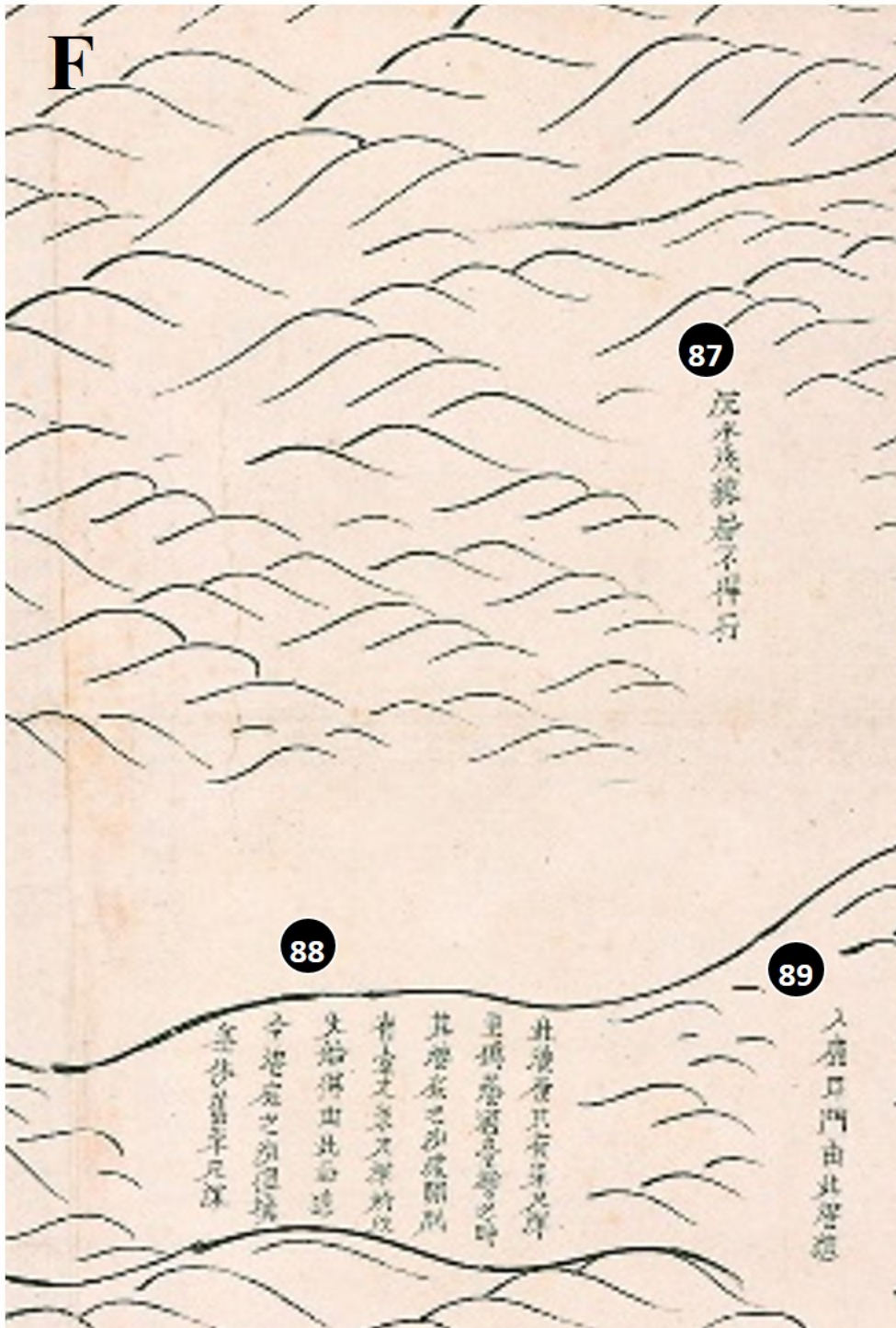
圖七 《臺灣略圖》之區塊 C



圖八 《臺灣略圖》之區塊 D



圖九 《臺灣略圖》之區塊 E



圖十 《臺灣略圖》之區塊 F

附表一 《臺灣略圖》的滿、漢文標記與翻譯

編號	語言	內容
1	中文	海壇山係福清縣管
	滿文	hai tan šan alin fu cing hiyan kadalambi
	譯文	海壇山山福清縣管轄
2	中文	凹裡
	滿文	wa li
	譯文	瓦裡
3	中文	虎井
	滿文	hū jing
	譯文	虎井
4	中文	澎湖山
	滿文	peng hū šan alin
	譯文	澎湖山山
5	中文	天妃宮前好拋船
	滿文	--
	譯文	--
6	中文	甘吉
	滿文	gen gi
	譯文	甘吉
7	中文	崎山
	滿文	ki šan alin
	譯文	崎山山
8	中文	將軍帽
	滿文	jiyangiyūn moo
	譯文	將軍帽
9	中文	八斗
	滿文	ba deo
	譯文	八斗
10	中文	大海
	滿文	amba medri
	譯文	大海洋
11	中文	金門所
	滿文	gin men šo
	譯文	金門所
12	中文	中左所即廈門今改思明州
	滿文	jung dzo šo uthai hiya men inu. te halafi sy ming jeo sembi.
	譯文	中左所即是廈門是今更換思明州云

13	中文	上淡水城至偽承天府半月路程
	滿文	šang dan šui hecen holo ceng tiyan fu ci tofohon inenggi on bi
	譯文	上 淡 水 城 偽 承 天 府 從 十 五 日 路 程 有
14	中文	蚊港
	滿文	wen giyang onggolo
	譯文	蚊 洋 港 口
15	中文	此處可泊船
	滿文	ere bade cuwan ilici ombi
	譯文	此 處 船 停 可 以
16	中文	蘇豆番社
	滿文	ma deo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蘇 豆 番 的 人 的 地
17	中文	宵龍番社
	滿文	hiyao lung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蕭 壘 番 的 人 的 地
18	中文	只一大厝
	滿文	jy i da ts'u
	譯文	只 一 大 厝
19	中文	新港半番民
	滿文	sin giyang onggolo fan i niyalma irgen suwaliyaganjame tehebi
	譯文	新 港 港 番 的 人 民 參 雜 居 住
20	中文	淡水
	滿文	dan šui
	譯文	淡 水
21	中文	泊舟
	滿文	cuwan ilimbi
	譯文	船 停 止
22	中文	偽天興縣無城偽縣官柯平
	滿文	holo tiyan hing hiyang hecen akū. Holo jyhiyan hafan g'o ping tehen
	譯文	偽 天 興 縣 城 無 偽 知 縣 官 古 平 駐 守
23	中文	北路
	滿文	amargi jugūn
	譯文	北 路
24	中文	目咖喇員番
	滿文	mu giyan la yuwan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目 咖 喇 員 番 的 民 的 地
25	中文	各偽鎮兵營
	滿文	Holo dzung bing ni coohai ing
	譯文	偽 總 兵 的 軍 營

26	中文	大目降民社
	滿文	Da mu giyang irgen i tehe ba
	譯文	大目降民的居住地
27	中文	左右武衛
	滿文	hashū ici ergi u wei
	譯文	左右邊武衛
28	中文	偽英兵鎮陳勇
	滿文	holo ing bing ni dzung bing cen yung tehebi
	譯文	偽英兵的總兵陳勇駐守
29	中文	梅港尾
	滿文	mei giyang wei
	譯文	梅港尾
30	中文	柴頭港民社
	滿文	cai teo giyang onggolo irgen i tehe ba
	譯文	柴頭港港民的居住地
31	中文	左右虎衛
	滿文	hashū ici ergi hū wei
	譯文	左右邊虎衛
32	中文	偽智武營顏夢忠
	滿文	holo jy u ing ni yan meng jung tehebi
	譯文	偽智武營的顏夢忠駐守
33	中文	豬勝山番
	滿文	ju loo šan alin fan i niyalma tehe ba
	譯文	豬勝山山番的人居住地
34	中文	小香洋民社
	滿文	siyo hiyang yang irgen i tehe ba
	譯文	小香洋民的居住地
35	中文	大香洋民社
	滿文	Da hiyang yang irgen i tehe ba
	譯文	大香洋民的居住地
36	中文	上港公民社
	滿文	Šang giyang gung irgen i tehe ba
	譯文	上港公民的居住地
37	中文	過此不入流番
	滿文	ere babe duleci lio fan i bade dosirakū
	譯文	此處越過流番的地不進入

38	中文	偽府尹翁天祐帶管操海軍門 偽府經歷林機 偽總制水路兼理五軍洪旭 偽國師盧若騰明季進士 偽參軍陳大舍兼六察 偽侍衛馮二舍 偽勇衛黃安 偽總聯絡民社土番洪大舍即洪旭之子
	滿文	Holo fu in mederi be kadalara giyūn men i baita be kamcifi kadalara ung 偽 府 尹 海 的 把 管 理 軍 門 的 事 務 把 兼 任 管 理 翁 tiya io tehebi. 天 祐 擔 任 Holo fu i gingli lin gi tehebi 偽 府 的 經 歷 林 機 駐 守 Holo muke olhon be uheri kadalara u giyūn coohabe kamcafi icihiyara 偽 水 陸 把 總 管 轄 五 軍 把 軍 兼 任 辦 理 hung gioi tehebi 洪 旭 擔 任 Holo guwe ši efujche ming gurun i jin ši lu zo teng tehebi 偽 國 師 已 壞 明 國 的 進 士 盧 若 騰 擔 任 Holo ts'an giyūn lu ca hafan kamciha cen ta se tehebi 偽 參 軍 六 察 官 兼 任 陳 大 舍 擔 任 Holo ši wei fung el še tehebi 偽 侍 衛 馮 二 舍 擔 任 Holo yung wei hūwang an tehebi 偽 勇 衛 黃 安 擔 任 Holo irgen tu fan i babe uheri kadalara hūng gioi i jui hung da še tehebi
	譯文	偽 民 土 番 的 處 總 管 轄 洪 旭 的 子 洪 大 舍 擔 任
	中文	偽左武衛林鳳
39	滿文	holo hashū ergi u wei lin hūwang tehebi
	譯文	偽 左 邊 武 衛 林 鳳 駐 守
40	中文	此赤礪城改名偽承天府其城極小原乃巴禮厝偽藩初過臺灣之日就在此內安住後打臺灣則搬入臺灣城
	滿文	[部分文字被遮蔽，無法識別]
	譯文	tuktan...halafi holo ceng tiyan fu seme gebulehebi 初 次 更 換 偽 承 天 府 起 名 Uthai tai wan hecen de...amala tai wan be...ci ba li ts'u inu holo wang 即 臺 灣 城 後 臺 灣 把 巴 禮 厝 是 偽 王
41	中文	偽左虎衛裴德 偽右虎衛林鳳
	滿文	Holo hashū ergi hū wei pei de tehebi 偽 左 邊 虎 衛 裴 德 駐 守 Holo ici ergi hū wei lin fung tehebi
	譯文	偽 右 邊 虎 衛 林 鳳 駐 守

42	中文	下港公民社
	滿文	Hiya giyang gung irgen i tehe ba
	譯文	下 港 公 民 的 居 住 地
43	中文	偽承天府乃總地號無城郭駕船到此登岸即大街市通商偽官員俱住在兩邊街上其兵俱屯在荒山上此地皆沙竝無山石樹木
	滿文	Holo ceng tiyan fu serengge uheri gebulehe ba hecen guwali akū cuwan ere 偽 承 天 府 所 謂 的 總 的 稱 名 地 城 城 郊 無 船 此 bade isinjiifi dalin de tafuci uthai amba giyai hūdašara ba geren holo hafan 處 來 到 岸 邊 登 即 大 街 交 易 地 眾 偽 官 gemu giyai juwe dalbade tehebi cooha gemu alin de tehebi ere gemu 全 街 二 旁 側 居 住 軍 全 山 居 住 此 全 yungga noho ba umi alin wehe moo akū
	譯文	沙 盡 是 地 山 石 木 無
44	中文	琅橋番聯絡土番至此處止
	滿文	Lang kiyoo fan i niyalma i tu fan i niyalma de ujan acaha ba ede mohoho
	譯文	琅 橋 番 的 人 的 土 番 的 人 邊 界 會 見 地 因 此 到 盡 頭 了
45	中文	上中洲民社
	滿文	Šang jung jeo irgen i tehe ba
	譯文	上 中 洲 民 的 居 住 地
46	中文	後紅仔民社
	滿文	Heo hung dz irgen i tehe ba
	譯文	後 紅 仔 民 的 居 住 地
47	中文	偽佐先鋒黃應 偽右先鋒陳澤
	滿文	Holo hashū ergi siyan fung hūwang ing tehebi 偽 左 邊 先 鋒 黃 應 駐 守 Holo ici ergi siyan fung cen je tehebi
	譯文	偽 右 邊 先 鋒 陳 澤 駐 守
48	中文	大厝
	滿文	Da ts'u
	譯文	大 厝
49	中文	大根鹿
	滿文	Da gen lu
	譯文	大 根 鹿
50	中文	角帶圍
	滿文	Giyo dai wei
	譯文	角 帶 圍
51	中文	下中洲
	滿文	hiya jung jeo
	譯文	下 中 洲

52	中文	放纜
	滿文	Fang so
	譯文	放 索
53	中文	梗吃番
	滿文	Geng c'y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梗 吃 番 的 人 的 地
54	中文	咖叮番
	滿文	Giya ding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咖 叮 番 的 人 的 地
55	中文	下淡水番
	滿文	Giya dan šui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下 淡 水 番 的 人 的 地
56	中文	此處可泊船
	滿文	Ere bade cuwan ilici ombi
	譯文	這 處 船 停 可 以
57	中文	大溪
	滿文	Da ki
	譯文	大 溪
58	中文	偽義武營陳
	滿文	[被其他文字遮蔽，不可見]
	譯文	
59	中文	偽仁武營林
	滿文	Holo zin u ing ni lin halangga niyalma tehebi
	譯文	偽 仁 武 營 的 林 姓 人 駐 守
60	中文	觀音山各偽鎮屯兵處
	滿文	Guwan in šan alin geren dzung bing ni cooha iire ¹⁰⁴ ba
	譯文	觀 音 山 山 眾 總 兵 的 立 軍 地
61	中文	偽左衝鎮林申
	滿文	Holo hashū ergi cung jen lin šen tehebi
	譯文	偽 左 邊 衝 鎮 林 申 駐 守
62	中文	半路竹民社
	滿文	Ban lu ju irgen i tehe ba
	譯文	半 路 竹 民 的 居 住 地
63	中文	二贊行萬年縣官謝岩
	滿文	El dzen heng wan niyan hiyan i hafan siyei yan tehebi
	譯文	二 贊 行 萬 年 縣 的 官 謝 岩 擔 任

¹⁰⁴ 原文寫作 iire，但並無此字，當為 ilire 之誤寫，意為「建立」。

64	中文	哆吧噠噠土社 偽殿兵鎮張榮
	滿文	...tusy i ba... 土司 的地 ...jen jang žung tehebi
	譯文	鎮 張 榮 駐守
65	中文	鯽魚潭民社 偽禮武營洪德
	滿文	Holo li u ing ni hung de tehebi
	譯文	偽 禮武營 的 洪 德 駐守
66	中文	此城有三層砲堅固臺灣改名安平鎮賊世子鄭經在內偽護衛鎮魏騰黃建并管烏鬼
	滿文	Ere hecen de ilan jergi poo faidhabi beki akdun tai wan be an ping jen 此 城 三 層 砲 排列 堅固 牢固 臺灣 把 安平 鎮 seme halahabi hūhai ši dzi jeng ging erei dolo tehebi. holo hū wei dzung 更換 賊 世子 鄭 經 此 的 內 居住 偽 護衛 總 bing wei teng hūwang liyan tehebi u gui be kamcifi kadalambi
	譯文	兵 魏 騰 黃 健 駐守 烏鬼 合併 管理
67	中文	偽援剿前鎮戴捷 赤山偽鎮屯兵處 偽前衝鎮翁陞 偽右衝鎮李卯
	滿文	Holo yuwan jiyoo julergi jen dai jiyei tehebi 偽 援 剿 前方 鎮 戴 捷 駐守 C'y šan alin geren holo dzung bing ni... 赤 山 山 眾 偽 總 兵 的 Holo julergi cung jen ung šeng tehebi 偽 前方 衝 鎮 翁 陞 駐守 Holo ici ergi cung jen li moo tehebi
	譯文	偽 右 邊 衝 鎮 李 卯 駐守
68	中文	水路可泊舟
	滿文	Mukei jugūn cuwan ilici ombi
	譯文	水 的 路 船 停止 可以
69	中文	打狗子番
	滿文	Dageo dza fan i niyalma i ba
	譯文	打 狗 仔 番 的 人 的 地方
70	中文	納底
	滿文	[被其他文字遮蔽，不可見]
	譯文	
71	中文	瀨口
	滿文	Da keo
	譯文	瀨 口

72	中文	鹽埕出鹽
	滿文	[被其他文字遮蔽，不可見]
	譯文	
73	中文	民社
	滿文	Irgen i tehe ba
	譯文	民的居住地
74	中文	民社
	滿文	Irgen i tehe ba
	譯文	民的居住地
75	中文	夾板往來泊舟處所
	滿文	Giya ban cuwan i amasi julesi yabure de ilire ba
	譯文	夾板船的後往前走停地方
76	中文	三崑昇
	滿文	San kun šeng
	譯文	三鯤鯨
77	中文	砲臺
	滿文	Poo i tai
	譯文	砲的臺
78	中文	二崑昇
	滿文	El kun šeng
	譯文	二鯤鯨
79	中文	此港極深從來過臺灣皆由此港入至城兜方進入赤礮城前拋泊地名一崑昇
	滿文	Ere ongolo umesi šumin daci tai wan de genere de gemu ere ongolo ci 此港非常深從前臺灣去皆此港從 dosime ceng deo de isinaha manggi teni ci k'an ceng hecen i julergi de 進入城兜到達後才赤崁城城的前 dosifi cuwan ilimbi ba i gebu i kun šeng
	譯文	進入船停止地的名一鯤鯨
80	中文	沉水淺線
	滿文	[被其他文字遮蔽，不可見]
	譯文	
81	中文	蟻港
	滿文	Joo giyang ongolo
	譯文	堯江港
82	中文	一帶可拋泊船千百隻但北風時其船甚搖擺至偽承天府前尚有壹里淺地若海水大潮則直到偽承天府前
	滿文	Ere emu girin i bade mingga tanggū cuwan ilici ombi damu amargi edun taha 此一區域的處千百船停可以只是北風拌住 de cuwan ambula aššambi holo ceng tiyan fu de isitala kemuni emu ba 船很搖擺偽承天府直到時常一地

		isime micihyan babi aikabade mederi ... ambula furgici šuwe holo ceng 達到 淺 地 倘若 海 後 淹沒 直接 偽 承 tiyan fu de isinambi
	譯文	天府從到達
83	中文	此地名北線尾搭草屋數間設官把守并盤詰往來船隻 小砲臺
	滿文	... gebu be siyan wei ... i boo udu... hafan sindafi tuwakiyabume amasi... 名 北 線 尾 的 家 數 個 官 放 置 看 守 後 cuwan be fujurulame baicabumbi 船 把 訪 問 使 檢 查 Ajige poo i tai
	譯文	小 砲 的 臺
84	中文	一名咖咾員
	滿文	Geli emu gebu giya loo yuwan sembi
	譯文	又 一 名 加 老 員 云
85	中文	此岸名海翁線入鹿耳門內至此一條線內可以泊船線外則大海
	滿文	[被其他文字遮蔽，不可見]
	譯文	
86	中文	鹿耳門
	滿文	[被其他文字遮蔽，不可見]
	譯文	
87	中文	沉水淺線船不得行
	滿文	Cen šui ciyan siyan i ba cuwan yabuci ojarahū
	譯文	沉 水 淺 線 的 地 船 行 不 可
88	中文	此港原只有柒尺深至偽藩過臺灣之時其港底之沙流開則有壹丈柒尺深所以大船得由此而進今港底之沙復填塞依舊柒尺深
	滿文	Ere onggolo i muke daci šumin nadan c'y bihe holo wang tai wande genere 此 港 的 水 從 來 深 七 尺 有 偽 王 臺 灣 進 入 fonde onggolo i fere i yungga eyefi uthai emu jang nadan c'y šumin oho 時 港 的 底 的 沙 流 即 一 丈 七 尺 深 了 tuttu amba cuwan bahafi ere baci dosimbi te onggolo i fere yungga geli 那 樣 地 大 船 得 此 地 進 入 今 港 的 底 掏 沙 又 furgibufi kemuni da an i nadan c'y šumin ohobi
	譯文	淤 積 時 常 原 來 本 的 七 尺 深 了
89	中文	入鹿耳門由此港進
	滿文	Lu el men de dosici ere onggolo ci dosimbi
	譯文	鹿 耳 門 於 若 進 入 這 港 從 進 入

引用書目

-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67271-006。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資料庫，下載日期：2018年11月17日，網址：<http://thcts.ascc.net/themes/rb04.php>。
- 〈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下載日期：2018年11月17日，網址：https://www.npm.gov.tw/exh101/books_archives/index.html。
- 巴 清（監修）
- 1969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
- 1997 《明清史料·丁編》，第1-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999 《明清史料·己編》，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
- 2004 《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第1-3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
- 中華書局（編）
- 1986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 孔令偉
- 2018 〈1724-1768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北京）2018(2): 27-48。
- 方 鼎等（修）、朱升元等（纂）
- 1967 《晉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王士禎（撰）
- 1983 《池北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 1989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63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朱瑪瓏
- 2014 〈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臺北）32(2): 49-82。
- 江樹生（譯註）
-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3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
- 2011 《熱蘭遮城日誌·第4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
- 余文儀（主修）、黃侑等（纂輯）
- 1983 《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邵廷采（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61[1697-1698] 《東南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9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1968[1689] 《西南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26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吳正龍

2000 《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出版社。

李 渲

2001 《燕途紀行·下》。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

阮旻錫

1958[1913] 《海上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婉窈

2007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0: 93-148。

林 豪（總纂）

1983 《澎湖廳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

林士鉉

2012 〈任教巨舶難輕犯 天險生成鹿耳門：院藏滿、漢文《臺灣略圖》簡介〉，《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49: 40-48。

施 琅

1958[1685] 《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麗完

2009 《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范承謨（撰）

1983 《范忠貞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倪在田

1962[1903] 《續明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13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夏 琳

1958 《閩海紀要》，臺灣文獻叢刊第 1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程祖洛等（續修）、魏敬中（續纂）

2011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南京：鳳凰出版社。

徐景熹（修）、魯曾煜（纂）

1967 《福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書 圖（修）、楊廷釗（纂）

2001 《龍川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

馬 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

1969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高拱乾（纂）

1978 《臺灣府志》。臺北：文海出版社。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1955-1958 《朝鮮王朝肅宗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

張 蔭

1985 〈鄭成功的五商〉，《臺灣文獻》（臺中）36(2): 15-34。

張 燮

1983 《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莊吉發（校注）

1989 《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莊勝全

2006 〈清康熙朝臺灣印象的轉變：以四位親歷者的觀察為例〉，《臺灣風物》（臺北）56(3): 27-59。

2013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新北：稻鄉出版社。

莊雅仲

1993 〈裨海紀遊：徘徊於異己與自我之間〉，《新史學》（臺北）4(3): 59-79。

曹 剛等（修）、邱景雍等（纂）

2000 《民國連江縣志》。上海：上海書店。

陳 柳

2009 〈德國在華軍事情報機關（1941-1945）〉，《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4: 153-194。

陳在正

1988 〈鄭芝龍在清鄭和談中所扮演的角色〉，《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1988(3): 117-124。

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2009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5冊。北京：九州出版社。

彭孫貽（撰）、李延罡（補）

1959 《靖海志》，臺灣文獻叢刊第3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程紹剛（譯註）

2000 《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美玲

2011 〈清初臺灣單篇山水遊記之探討：以陳夢林、藍鼎元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臺北）42(1): 25-47。

黃福慶

1984 〈甲午戰前日本在華的諜報機構：論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3: 305-331。

黃德溥等（修）、褚景昕等（纂）

1975 《贛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8 《閩海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2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7 《清耆獻類徵選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趙爾巽等（撰）

1976-1977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劉獻廷（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5 《廣陽雜記選》，臺灣文獻叢刊第21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蔡偉傑

2008 〈殖民檔案與帝國形構：論清朝滿文奏摺中對臺灣熟番的表述〉，《臺灣史研究》（臺北）15(3): 25-55。

蔣良麒（編）

2006 《康熙朝東華錄》。臺北：文海出版社。

蔣毓英（纂修）

1997 《臺灣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鄭喜夫

2006 〈〈永曆 18 年臺灣軍備圖〉之由來〉，《臺北文獻（直字）》（臺北）155: 27-43。

鄭瑞明

2004 〈清領初期的臺日貿易關係（1684-172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臺北）32: 43-87。

鄭維中

2004 《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出版社。

2018 〈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收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頁 385-44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鄭瑩憶

2017 〈仰沾聖化、願附編氓？康熙朝「生番」歸化與番人分類體制的形構〉，《臺灣史研究》（臺北）24(2): 1-32。

盧正恒

2016 〈旗與民：清代旗人鄭氏家族與泉州鄭氏宗族初探〉，《季風亞洲研究》（新竹）2: 115-151。

賴毓芝

2012 〈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75: 1-76。

謝金鑾、鄭兼才（總纂）

1984 《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羅麗馨

2017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朝、明三國軍中之疫疾、情蒐與通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47: 117-157。

鐵 保等（纂修）

1983 《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Aldrich, Richard J.

1998 "Britain'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London) 32(1): 179-217.

Andrade, Tonio 歐陽泰

2010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Honolulu, HI) 21(4): 573-591.

Bang, Peter Fibiger and Darius Kotodziejczyk

2012 "'Elephant of India': Universal Empire through Time and across Cultures." In Peter Fibiger Bang and Darius Kot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 pp. 1-40.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key, Karen

- 2008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g, Weichung 鄭維中

- 2013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6 “Admiral Shih Lang’s Secret Proposal of Returning Taiwan to the VOC.”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pp. 290-31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嬌燕

- 1999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vid-Fox, Michael, Peter Holquist, and Alexander M. Martin

- 2006 “The Imperial Tur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 7(4): 705-712.

Doyle, Michael W. 多伊爾

- 1986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lliott, Mark C. 歐立德

-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hosh, Durba

- 2012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Washington) 117(3): 772-793.

Go, Julian

- 2011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ng, Xing 杭行

- 2015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man, John E. 喬荷曼

- 2007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ostetler, Laura 何羅娜

- 2001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u, Cheng-heng 盧正恒

- 2016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Bandits: The Rise of Zheng Zhilong and His Organization, the Zheng Ministry (Zheng Bu, 鄭部).”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00-1700*, pp. 132-15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kdisi, Saree

1998 *Romantic Imperialism: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ward, James A. 米華健

1998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due, Peter C. 濮德培

2017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 of Asia: Its Promises, Perils, and Prospects.” *Thesis Eleven* (Clayton) 139(1): 129-144.

Teng, Emma Jinhua 鄧津華

2004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Weinstein, Jodi L.

2014 *Empire and Identity in Guizhou: Local Resistance to Qing Expans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pies Delegated and Recruited: Zheng Espionage Network, Qing's Knowledge of Islands, and *Taiwan Lue Tu*

Cheng-heng Lu

ABSTRACT

With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anchu and Chinese langua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espionage network established by the Zheng family operated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explores how the Qing Empire used intelligence from this network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islands on the southeastern coast and Taiwan before their conquest in 1683.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Zheng espionage network conducted secret spying missions in China proper collecting detailed intelligence, which was in turned obtained by the Qing Empire, also through espionage, for learn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neighboring islands prior to conquering them. The *Taiwan Lue Tu* (the brief map of Taiwan), archived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as draft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sketch map not only served military purposes but also constituted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Qing Empire on Taiwan. The cartography of Taiwan included the Chinese version made by the Zheng commanders and the Manchu version constructed by the Qing court. Manchu descriptions on the map reveal that the Qing court perceived itself as a universal empire. By understanding how the Zheng espionage network operated and how the Qing Empire exploited its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Qing court transformed Taiwan into an imperial borderla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imperial history.

Keywords: Imperial History, Zheng Family, Qing Empire, Ming-Qing Transition, Spy, *Taiwan Lue Tu*